



發揮市民力量，繼續反對23條立法！

當局無理擇控和平遊行人士

江澤民主控的中共十六大

美國借9.11建立世界霸權

美國最終目標是統治全世界

繁榮之後的美國經濟：一個診斷

從日銀買私營銀行股看日本金融危機

親切悼念王凡西老革命家(1907-2002)

親切悼念 王凡西老革命家 (1907-2002)



十月評論社同人

Wang Fanxi 1907 - 2002

老革命家王文元，字宇仁（筆名王凡西）不幸於今日因心肌梗塞去世，享年95歲。本社同人深感難過、惋惜。

王凡西的一生，是艱苦地戰鬥、不倦地思索的一生，堪可為後世的革命者學習的。他在1927年五卅運動期間北京大學肄業時，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同年中離開北京到武漢，再轉到莫斯科入東方大學學習。中國1925-27年革命失敗後，他贊同托洛茨基對斯大林領導中國這次革命的路線錯誤的批評意見，成為在莫斯科組成的「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成員之一。1929年秋返國工作，嗣後被中共中央驅逐出黨。

1931年，他又被國民黨政府逮捕，第3次入獄，至1934年年底才釋放出獄，在上海繼續從事地下革命工作，主要是思想理論研究及寫作宣傳，並與鄭超麟合作，分別譯出托洛茨基的三大卷《俄國革命史》等書。

1949年5月，中共解放軍進入上海之前，他被迫離國，到香港居住。（沒有離開的鄭超麟等托洛茨基主義者，則在52年12月下旬全部被拘禁，許多人達

20多年才重獲自由回家。）不很久，因收取外國報刊及通訊關係，遭港英政府發覺，遞解出境至澳門。在澳門居住期間，他「在寂寞中思索」，於1957年寫成了《雙山回憶錄》。其後，譯出了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於11年後以惠泉筆名出版。他更先後撰寫了《毛澤東思想和中蘇關係》、《毛澤東思想論稿》等著作。他的寫作造詣甚高，文風字句美麗動人，十分難得。

由於得到外國友人的幫助，王凡西終於能夠移居英國，在英格蘭北部的里茲大學講學，生活問題亦可以解決，從此過著安定的生活，直到走完他的人生最後一段歷程。

他在運動圈中以「連根」筆名發表政論等等，表現了他要把舊社會制度「連根拔起」的志向、決心，從而又得到大家以「根叔」來親切地尊稱他。雖然他這個志向沒有親見到實現，但我們同他一樣地深信，這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總會被革命連根拔起地徹底改造好的！

2002年12月30日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29卷 第4期（總第211期）

2002年12月31日出版

督印人：陳昌

出版 / 承印 / 編輯：〈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10144 號

電話：9846 3428 傳真：2346 5268

Address：G.P.O.BOX 10144, HONG KONG

Tel.No.：(852) 9846 3428 Fax：(852) 2346 5268

E-mail Address：october_review@yahoo.com

【十月評論內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發揮市民力量 繼續反對23條立法 本刊評論

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條例諮詢文件公佈後，日益激發起全港非常普遍而強烈的反應；幾個月來，各報章幾乎每天都有報道以至評述這個問題，反對和支持兩種意見日益對立鬥爭，成為香港歷史上罕見的嚴重爭議問題。而由於政府有關負責官員（例如保安局長）的屢次強硬「過位」發言，一直表示堅拒反對一方的重要要求，律政司司長又指席揚「不講消息來源便是偷」，並承認「刀已在傳媒頭上」……，這些都更加火上添油，使社會矛盾更尖銳化，分化更加嚴重。

諮詢期結束後，當局公佈共收到9萬份意見書。而民間人權陣線則收集到38萬個市民簽名反對23條立法。據12月27日《信報》報道，多項調查顯示，過半數市民反對現在立法，7成要求白紙諮詢，學者指港府正面對回歸後最大的管治危機。

如果這樣嚴苛的立法達成，將會大大收緊市民一向爭取到享有的言論等自由權利，嚴重破壞原有法治和香港的「一國兩制」，使香港迅速走向一國一制化（官僚專制化）。這些是絕大多數市民要反對的主要原因。

最有力而具體地表現出這種反對的，是12月15日的6萬普通市民大遊行，參加者是自發自動的，大多數人都在沿途加入隊伍，路旁站著沒加入的市民也齊聲高喊反對立法，情緒激昂，情景動人，寫下了八九民運百萬港人大遊行以後第二大規模遊行的歷史記錄。基層市民（包括葉劉淑儀語帶蔑視地說不會同她討論條文的飲食等業員工）用反對行動答覆了保安局長。

所有的民意調查結果和獨立團體表態，都表明反對意見是佔絕大多數的。

據香港記者協會和影協調查結果，有近900新聞從業員反對立法，記協發起國際聯署，擁有50萬會員來自多個地區的26個傳媒組織已表示支持。

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的調查顯示，有8成左右受訪新聞工作者分別認為立法建議影響新聞採訪報道

和言論自由，近6成和7成分別認為根本無必要立法和要求發表白紙草案。

代表1萬8千家出版機構的世界報業公會和外國記者協會，都指責23條立法將削弱新聞言論自由，10個民間組織（包括亞洲人權觀察、國際特赦協會香港分會、亞洲學生協會等）聯合聲明反對立法，44位國際知名學者也發表公開信抗議立法。

工商金融界則表示出憂慮和要求。例如，立法會金融界代表李國寶稱，至少10家外國銀行和他個人都希望用白紙草案；歐洲商會港辦主任柯力豪表示，政府應公佈條文內容細節作第2輪更深入諮詢，「魔鬼就在細節之內」。

法律界是很熟識法律條文及富分析能力的。我們看到，從香港到國際，他們對23條立法所發表的意見，幾乎都是不同意以至反對的（除了香港及內地一小撮死硬的官方支持者如譚惠珠等之外）。香港大律師公會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這項立法，並詳細而具體地指出諮詢文件的錯誤及含有的處處「陷阱」。

香港律師會一向被認為立場較保守、較支持政府、曾經支持過「人大釋法」的，現在也發表意見書，認為政府的立法建議有多項明顯超出《基本法》規定範圍，會損害言論、集會等自由，建議當局刪除多項立法建議，並提出白紙草案進行第二輪足夠時間的公眾諮詢。

《基本法》委員會港方成員，香港大學法律學系教授陳弘毅，以前曾表現得穩健慎言、幾次表態支持政府，這次也指出，過去（港英）政府曾多次就重要問題推出白紙草案；當局若漠視民意，堅持強行立法，只會嚴重失去民心；港府在立法會已爭取到足夠票數，令立法獲得通過；以白紙草案再諮詢，不代表會延誤立法。

在國際上，英國大律師公會正式向港府提交意見，促請港府應發表包括草擬條文的白紙草案，同時又讚許香港大律師公會對諮詢的回應書是當前對23條立法最全面和最具學術水平的分析，其觀點極具說服

力而無可置疑。

23條立法已嚴重打擊了市民對香港的政治信心，最近的信心指數較去年同期大幅下跌，包括「司法制度信心」、「新聞自由」和「民主發展」信心，跌幅超過2成，這是香港政策研究所在12月27日公佈的調查結果。

中大亞太研究所的調查顯示，有86%新聞工作者不滿特區政府近半年的表現，滿意的只有約1成。這也充份反映出特區政府管治之極不得民心；而使人很不滿的表現自然是硬推23條立法。

北京中央政府使港府要這樣地立法，勢將自毀其「一國兩制」的許諾，喪失其原定的以香港成功實行「一國兩制」的示範作用，以致使台灣當局更加不相信中共在台灣推行一國兩制、達成和平統一的「誠意」。

遭受到非常廣大市民強烈反對的巨大壓力，使得一直態度飛揚跋扈的保安局長暫時不再像大遊行之前那樣幾乎日日站出來作強硬發言，而表示有些條文可考慮修訂，但仍堅持9處不退讓。她之這樣依然強硬，一來會是認為自己忠於黨中央、得到京官作靠

山；二來有一批親京港當局「保皇黨」的死硬支持，他們在12月22日，也發動了號稱有4萬人的維園大集會，表態支持23條立法。集會組織者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名，一方面煽起部份人的狹隘愛國主義情緒，誤導人們以為反對立法便是不保衛國家安全；另方面則以領導層決定的行政手段，變相地強迫工會會員和中資機構員工參加，各街坊會又以專車接送和會後聚餐作招徠。然而，工聯會號稱有約18萬會員，領導人又全力發動，結果，加上其他單位總共仍只及前一週日參加人數的3分之2。

看來由保安局長專責泡製的23條立法，在未來半年內仍會大致上以諮詢文件的內容並依原定時間表完成立法。只有全港絕大多數市民發揮出更強大的反對力量，才能改變這個趨勢。我們曾在本刊上一期刊出《反對23條立法》一文，詳細指出其錯誤和有害性，號召港人起來齊心合力反對立法；今天還要繼續呼籲市民必需再接再厲、更有力地反對當局的一意孤行，直到達成目的為止！

2002年12月28日

當局無理擇控和平遊行人士

振言



選擇性政治檢控無理

香港回歸後，欽點的臨時立法會恢復了95年已修訂、刪改了的部份《公安條例》，更規定授權警方可用「國家安全」等為名，事前審查遊行集會，甚至不予批准，限制香港市民的遊行、集會等自由權利。最近，警方拘控了學聯兩名成員馮家強和盧偉明以及「四五行動」梁國雄，首次引用有關《公安條例》進行起訴。這宗案件向港人和國際社會展現出《公安條例》反民主的本質和作用，顯示港府實行逐步收緊市民一向享有的遊行、集會等自由。

根據警方資料，1998至02年10月，共有527宗沒有通知警方的集會遊行，而參加的市民多到無法統計。但現在只選擇上述3人來控告，目的明顯是針對四五行動和學聯，這是被控告的示威者在法庭上答辯時指責當局的。

示威者又指責：《公安條例》要求示威者於遊行前7天通知警務處長，先取得「不反對通知書」，並規定給予處長反對的權利，是侵犯「集會及遊行自由」，7天通報期亦過長。

總裁判官李瀚良在判詞中雖然回應，說警務處長可接受少於7日的通知，若反對亦須表明理由；但他仍然批評：「控罪本身帶政治性質，本席有好大疑問是否交由法庭處理」。（11月26日《明報》）

他也「質疑由99年至今共有300多宗少於7天通知的集會，當局都沒有檢控。」這等於說，這案件具有政治性選擇性，法庭是不應審判的。但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對此質疑並不能正面而有理由地回答，只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地重申，「檢控並非政治迫害」，又強調「我看不到不在法院處理，可以怎樣處理？」（見12月4日《明報》論壇載時事評論員吳志森題為《公安法政治控罪，梁愛詩須回答》一文）

即使是這位獨立的時事評論員，也在他的上引文章中指出：「如果當時政府官員沒有公開說謊，按照他們所說的表面解讀，7天前通知警方只是為了防止遊行示威出現混亂的手段，是一種技術性的規定，而……沒有7天前通知警方，至多是技術犯規，若因此而引起混亂，才應構成犯罪。」這就非常客觀有理地批駁了當局的無理檢控，回應了李瀚良法官不應由法庭檢控的質疑。

示威者又指出：警務處長可基於「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等理由反對遊行，有關概念太含糊，對警權缺乏制衡。

對此，主理的法官也認為：「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等字眼根本很難準確規範，尤其是「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以上引述的法官意見，俱來自11月26日《信報》報道）

和平遊行無罪

總裁判官判定：「在整個事件中，沒有任何人有暴力的意圖，實際上也沒有暴力行為，本席認為這是一個和平的遊行。」

而和平的遊行、集會、示威，則不但不是犯法，且更是當局必須加以「確保」，這是特首在5年多以前如此公開承諾的：「必須確保市民日後仍依舊繼續以和平合法的方法，舉行遊行示威。」（董建華於1997年4月17日，以候任行政長官身份在報業公會頒獎禮上作出上述承諾。）（引自11月26日《明報》）除非他詭言說他以前只是指「合法」的遊行示威，而當日的遊行則沒有照規定於7日前通知，因而

是不合法的。如果這樣，就是企圖以技術性問題否定人權公約和基本法對保障自由權利的原則性規定。如果特首97年的承諾不用事實、行動來實現，則他不久前信誓旦旦地公開說，這次的23條立法絕對不會減少市民已享有的自由人權，又會有什麼價值！

然而，儘管李瀚良法官有上引這樣的批評意見，但他仍必須執行法律的規定和法庭的職責，判3被告「有罪」，但「輕判」各簽500元守行為3個月，兼留「案底」；他並且要替當局多方辯解。這又一次說明，法庭是統治者打壓異己、限制市民基本權利的政治工具，不能超然獨立的。這也揭破了官方今天說23條立法將有法庭把關的論據；到那時，法庭仍然是當局同樣的政治工具。

《明報》在上述的報道同時，也在其社評中表示：「我們同意總裁判官李瀚良的觀察，這宗和平集會完全沒有影響公眾秩序，律政司根本不應該提出檢控。」「僅僅因為集會組織者未有依照法例的技術規定——事先提出申請，便對和平集會提出檢控，明顯不符合公眾利益。律政司應該虛心聽取法院的批評，重新檢討這方面的檢控決定，而最徹底的解決辦法則是修改法例」。《明報》社評所指應予修改的法例，就是惡法《公安條例》，它使港府及其律政司在這次檢控3人中自暴其醜，也是自食其惡果，進一步喪失廣大市民對當局的公信力。

當局拘控3人也是一個惡訊號，表示將有更多更嚴厲的打壓市民和收緊自由人權的言行，以威嚇一般市民不再去運用其應有的權利。警方在不久前再拘捕及起訴四五行動成員劉山青和前線成員陶君行，就是具體的表現。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月前承認「已加強注視（非法集會）」，又是壓制集會自由的警號。當局選擇這5位人士來檢控，就是想先擊敗敢於時常起來反對當局倒行逆施的積極戰士。

由此向港人啓示了，今天特別變本加厲地要壓制市民自由人權的23條立法，比之《公安條例》更嚴苛、更全面、更兇惡，也因而更加激發起市民的普遍、強烈反對。要阻止統治者肆無忌憚地剝奪市民的自由權利，唯有廣大市民齊心起來表現其力量，才有可能！

2002年12月20日

江澤民主控的中共十六大

張開

中國共產黨第16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通過了江澤民所作的政治報告。繼任總書記的胡錦濤大讚這個報告是中共在新世紀新階段的政治宣言，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行動指南、指導思想。在江澤民直接領導起草的報告中，把他去年提出的「三個代表」思想寫了進去，又寫進了經16大修改後的黨章內，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相提並論、等駕齊驅，以顯出江這個思想的同等重要性，希圖以此確立江澤民的同樣重要歷史地位，又一次表現出中共製造個人崇拜的傳統做法。

13年來的「工作成績」

關於「三個代表」這種思想，最初是江澤民在去年7月1日的建黨80週年講話中提出的。他要中共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筆者曾對它加以評論（題為《評江澤民的建黨80週年講話》，刊於《十月評論》總第206期內），並舉出許多重大事例，證明中共實際上是與江所宣稱要代表的事完全相背離的；江說中共要代表它們，只是「美麗的謊言」。他所指的「先進生產力」，照理應該是指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先進文化也不應是指資本主義的文化。但他掌政10多年期間的所作所為，都是日益背離社會主義的方向和原則的。

他「提議」在報告中加強對13年來工作成績的論述。因此，報告力陳2001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已達到9.59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比1989年增長近兩倍，年均增長9.3%，經濟總量已由世界第10位躍居第6位。「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

所謂「總體」，就是指「事物的全部、整體」。
<1>因此，上引江這句斷語的意思應該是：中國全部（或整體）人民的生活都已經不祇是溫飽，而且已進入小康的水平了。國家計委主任曾炎培解釋，中國雖然實現小康，但屬於低水平的小康，在2000年時，中國人均GDP為800美元，而中等發達國家的則為2000美元。儘管兩者相差如此大，中國官方仍自認中國已達到小康水平。

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後果

雖然朱鎔基最近仍在公開勸告官方的統計數字不要造假，反映出這種情況仍然存在；但現在，姑且不論上述官方的GDP數字有多少浮誇成份（「水份」），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卻主要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不是建基於社會主義民主之上的社會主義經濟性質的，因而也必然帶來資本主義發展所產生的各種弊病：各企業主及其管理人員單只為着追求盡可能多的利潤而生產，卻不是為着滿足全體人民的需要的。因此，生產處於無計劃、無政府狀態，時常會有生產過剩，停產關廠，造成工人大量失業，貧窮人口增加，並趨於赤貧化，加劇社會分化、貧富懸殊。江澤民主政以來的13年，便加劇了這樣的惡果：

——失業人數日益大增。多年以前，官方還在堅持「待業」者數字遠比民間及專家估計的為少。到今年3月，曾炎培向人大會議報告，截至2001年年底，中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6%，失業人數685萬，加上國企下崗職工515萬人，總量為1200萬人左右。在16大記者會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張左己宣稱，目前（9月底為止）登記失業人口達752萬人，失業率為3.9%（他承認這個數字沒有包括下崗職工600多萬人）。但朱鎔基卻在此前外訪時指出，中國的實際失業率為7%。
<2>而張左己還表示，隨着中國加快沒落的國營工業的破產程序，失業問題勢將惡化。
<3>曾炎培在上述的記者會上也說：「現時尚有下列工人待就業中心，未能就業，加上每年學校畢業投入就業市場的1千萬人，以及農村釋放出來的勞動力，大陸失業問題確實很嚴重。
<4>據北京大學教授蕭灼基表示，中國城鎮的實際失業率大概在15%到20%，這還不包括農村將近1億的潛在失業人口。「中國的失業率是全世界最嚴重的。」
<5>「有專家估計，未來幾年內，中國失業人數將達到3億之眾。」
<6>

——收入差距及貧富懸殊日益擴大。香港《文匯報》引述國家統計局局長朱之鑫報道，改革開放以來，堅尼系數逐漸擴大；截至2000年，全國的堅尼系數為0.417，不僅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也超過了高收入國家90年代0.338的平均水平。（引自10

月7日《蘋果日報》)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的對8個省市近4千戶家庭抽樣調查顯示,截至今年6月底,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產的1.4%,而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的財產總額佔45%,其餘80%的家庭則佔53.6%。城鎮居民家庭的平均財產達22.8萬元。〈7〉

——城鄉居民收入懸殊。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表示: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於賬面上的3比1(官方數字是:全國城市居民收入為6860元,農民收入為2366元);而應為5比1,甚至6比1。去年一名農民每月的真正貨幣收入僅120元人民幣。〈8〉這即是說,真正年收入不到1500元,遠低於上引的2366元。如果以10大城市的人均年收入都逾1萬元人民幣計(深圳更高近2.4萬元),差距就更大。

——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持續擴大。國家統計局最新的數字顯示,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的東、中、西部三大地帶經濟發展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而且還有不斷擴大之勢。它的資料表明,至01年,東部地區對全國GDP的貢獻率為57.8%,中部為27.9%,西部地區僅為14.3%。〈9〉這顯示,東部與西部的差距為4比1。而江澤民的報告則說,在2000年,東部地區的人均GDP為1400美元,西部地區則為800美元。這兩者的差距是1.75比1,西部地區的人口為3.6億左右,佔全國人口近30%,即使按人均計算的GDP的結果會有些不同,但上引官方的兩種數字,也不應相差如此之大。到底是江澤民說的還是國統局公佈的何者較接近真實呢?官方對此是必須向人民交待的。

——農民收入逐年減少。官方資料顯示,自97年以來,農民收入增長速度連年下滑,與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擴大,而苛捐雜稅攤派負擔則難以大為減輕。中國入世後外國農產品廉價傾銷,和中國政府減少對農民的補助,更大大影響農民的收入。

據《信報》駐京記者任慧文報道:「當今生活在農村的7、8億農民中,約有一半過著清貧的生活,構成一支不受約束、極不穩定的貧困大軍。」〈10〉數以億計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要湧向城市找工作,但城市工人失業者多,又被迫要被遣回農村。「三農」問題日益嚴重,主要原因是由於中共長期的政策措施所造成,江澤民執政以後即使推行費改稅,也是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三農」的困難問題的。

上述各種實際情況表明,中國今天仍有頗大百分比的人民生活在窮困之中,並沒有像江澤民所誇稱的已進入薄有資財、可安然無憂地度日的小康境地。

江澤民在他的報告中也被迫勉強承認上述的部份

問題存在,但卻盡量含糊其辭,力圖減輕其嚴重性。他如此描述:「我們工作中還有不少困難和問題。農民和城鎮部份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失業人員增多,有些群眾的生活還很困難:收入分配關係尚未理順;市場經濟秩序有待繼續整頓和規範;……」他不願客觀地面對上述諸問題,表明他也不願認真加以解決。

政治改革持續倒退

江澤民主政的13年,是政治民主改革不斷倒退的13年。他取代了趙紫陽黨總書記職位、隨同李鵬壓平了八九民運,更兼掌了國家主席、兩個中央軍委會主席的大權,逐步形成了個人專權獨斷、容不得民主開放的政治局面;所有要求民主、自由、人權的人士都被壓了下去,中國民主黨、法輪功等組織被取締,其中許多成員都被投入牢獄;有些著名的民運、人權活動分子,則被當作北京與外國統治者政治交換的籌碼,強迫放逐到外國去,除卻了後顧之憂,以圖使得中國重新變成萬馬齊喑的局面。近幾年來,大量工人被辭退或「下崗」失業,他們為了爭取應得權益,被迫起來示威、集會、抗議,或者到政府機關請願,都被壓了下去;有些工人代表(例如遼寧鐵合金廠的多名代表)更被拘禁,以莫須有罪名判處徒刑。流亡海外的楊建利,在重回中國後卻遭拘捕;王炳章則在越南旅行時被十多人「綁架」回國,後來便被當局正式拘捕控告;在16大前夜,各地一批民運人士又被拘禁;在16大開幕頭兩天,在天安門廣場帶著傳單的幾位人士也被沒收傳單和帶走……所有這些舉之不盡的反民主事例,都是在江澤民13年來掌權、領導之下發生的,表現了他的保守、倒退特色。

儘管這些事實俱在,任人皆知,但江澤民的報告仍大筆吹噓他執政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設成效顯著。民主法治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邁出新步伐。」但他卻沒有同時舉出任何事例去支持這些吹牛說法。實際上,不要說比資本主義民主多無數倍的社會主義民主在中國從未出現,即連資本主義社會也容許存有的起碼民主自由人權,也給中共的一黨專政所扼殺了。

倚重企業家

中共一方面對工、農分子和爭取民主自由人權人士是如此敵視、打壓;另一方面又對新生的社會中上階級、階層大加優待:這個報告提出,「民營」、私營企業主、技術人員、個體戶、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者等社會階層,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

的建設者。「海內外各類投資者在我國建設中的創業活動都應該受到鼓勵。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都應該得到保護。」

這就是為正式承認私有財產完全合法作出辯解，指導全國人大討論通過進一步保護私有財產的《護權法》。

中國1988年修改後的憲法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產和其他合法財產所有權。國家亦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繼承權。」「在確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前提下，承認私人合法財產的所有權。」不過，現行法律中還沒有「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條文保護。這使得企業家、有巨富者不敢公開自己的大量資產。上引16大的報告，對此疑慮提出了明確的保證。

同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透露，16大提出「毫不動搖」地支持民營企業發展，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一是「市場准入」，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二是提供融資便利；三是解決不合理的稅費負擔。這些措施將大大加快民企的發展、壯大。

公開改變中共的階級性質

整篇報告多次只提「社會階層」，而不用「階級」這個詞，反映出他們不認為中國有資本家等階級存在，從而意味他們已背棄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的基本理論（最有名的是《共產黨宣言》開頭的「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為了替它的修正馬克思主義作「理論創新」辯護，報告搬出如下的論點，暗示所有不合中共目前需要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都應該加以拋棄：「我們一定要適應實踐的發展，以實踐來檢驗一切，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

它甚至公然改變中共黨章中關於「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個傳統規定，而謊稱「黨從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後一種「先鋒隊」的提法是以前沒有過的。

於是，它在後來便提出：「要把……符合黨員條件的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吸收到黨內來」。這個提議自然也被16大採納並被寫進新黨章內，而加上「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也可申請入黨。這裡所說的「其他社會階層」，就包括「私營企業主」、資

本家。這也就是它對中共的性質不動聲色地加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的主要用意所在。

吸收私營資本家等「社會階層」入黨的主張，在江澤民去年的「7.1」講話中已經提出，而且實際上已經實行了。這次再在政治報告中提出，只是要正式由全國黨代大通過，並寫入黨章內。這標誌出中共已經不但早在實際上、而且也在規章上背棄工人階級，而轉變成中產階級的代表了。

轉變的原因

上述的重大轉變，原因之一是私營經濟在中國發展迅猛，已成為經濟重要組成部份。《紐約時報》一篇評論指出，私營企業近年在中國國民經濟比重中佔了3分之1。〈11〉以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為例，截至今年9月底，上海有私營企業近22萬家，僱工2百多萬人，其中有今年1-9月新增的4.3萬多家，單是7-9月便增加了2萬多家，〈12〉可見新增勢頭的迅速。江蘇省民企的發展也較快（私企有24萬家），非國有經濟現已佔了該省經濟的41.7%，國有和集體經濟則佔58.3%；預計今年全省的GDP可達到1萬億元，人均GDP1萬4千元。在該省的68名16大代表中，「私營企業家」便有10多名，〈13〉這正是私營經濟實力大增的結果之一。

另一個原因是，中共黨員幹部已經普遍地從經濟發展中大獲私利，中共黨員有36萬人已成為民企老闆（私營資本家），他們通過各種形式入黨，或者長期保留中共黨籍，「下海」營商後沒有放棄黨籍；也有一些民企老闆為了入黨，將企業轉歸配偶或家人名下，自己則以僱員身份入黨。〈14〉

出席16大的代表席位，和選出的中委、候補中委名額，都顯示出中共對企業家們的開放和器重。在出席代表中，有不少是「私營企業資本家，他們藉着黨員幹部的特殊優越條件，許多人都已擁有巨大的個人財富，例如，江蘇、重慶、廣東等有多名黨員「企業家」都擁有幾億至10多億（港元計），曾任中共張家港市委書記的沈文榮，就擁有12億港元個人資產。〈15〉

在選出的新領導層成員中，中石化國企董事長李毅中獲任為中央委員，9名國企領導人獲選為候補中委；另有非傳統國企的TCL國際董事長李東生，則晉身中央紀委，他持有該國企的9%股權，間接持有的股權值3.58億元。〈16〉

在16大的中委會158名候補委員中，有15名企業

家，其中「有集體所有制民營企業春蘭集團和國企股份化後的海爾集團兩大民營企業的首席執行官陶建幸、張瑞敏」。^{<17>}

他們能夠參與中共的新領導層，將可在決策上發揮影響力，爭取企業、尤其是民企私企的權益，以政治權力來鞏固其經濟實力。

在有產階級在中國日益崛起、資本勢力日益膨大後，資本與權力的結合、中共幹部與資本家的聯繫將更加緊密，貪污腐敗情況也會更加嚴重。但江澤民的《報告》對於這個人民非常不滿的貪污腐敗問題，只是簡略地重彈過去的舊調，並沒有提出徹底有效地肅清貪污腐敗的新辦法。中央紀律委員會的領導班子即使換了大部份成員，也將會「肅規曹隨」，不能真正地「從源頭、體制、機制上反腐」，因為，各級幹部依然享有政經特權，不受人民群众的監督、彈劾，以至撤換。這樣的舊制度、舊體制，正是貪污腐化的源頭、溫床，16大所通過的報告對這些並沒有作出任何重要改變的決定。

江澤民仍握有最大實權

江澤民在16大上宣稱：中共已順利實現了新老交替。大概他所根據的主要表現是16大選出了9名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原任的6名常委都不再續任而退了下來。從法理形式上看，6名舊常委是交出席位了，但如果不是由於在派系權力鬥爭中被更強大對手鬥垮而退下（例如，李瑞環可能因據說與江有歧見而不和），則離職的元老仍會保有其影響力，過問日後的黨政大事。特別是江澤民，他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支持者佔絕對優勢」、「上下左右都可看到江的人」（見《信報》題為《胡錦濤上位而未掌權》的社評和引用大陸一位人士的描述），更使他成為「垂簾聽政」的「太上皇」。

江澤民仍握有最高的權力，也可反映在如下事實中：在16大閉幕後的官方排名中，他仍列第1位，在胡錦濤前面，這與以前胡耀邦、趙紫陽出任總書記時鄧小平排第二位不同；在官方傳媒的並列照片中，他比胡錦濤佔的位置更大很多；他依然以最高領導人的態勢公開露面，出場時走在胡前面；以前報道常見的在黨中央前面加上的「以江澤民總書記為核心」的慣用語，則改稱為「在胡錦濤總書記的領導下」，暗示出胡仍未取代江成為「核心」。特別重要的是，江續任中央軍委會主席一職，握有「槍指揮黨」的實際大權。這些都表明他自己實在沒有做到「新老交替」。

而明顯表現出來的是軍方將領的表態。在江續任

消息宣佈後，全軍立即響應說：「一定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與黨中央、中央軍委保持一致，一切行動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指揮」，把黨中央同中央軍委等量齊觀。北京軍區司令員朱啓更在《求是》刊文明白地表示：江澤民繼續擔任中央軍委會主席，是中共「作出的重大政治選擇，是黨的事業興旺發達、國家長治久安和推進軍隊建設的政治保證」；並且強調「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江主席的指揮。」這些都意味江仍繼續擁有無上指揮權，將很少可能在03年3月辭去兩個軍委會主席職位。

總觀16大的結果，是在政治上更加保守、倒退、不民主，理論上更多修正主義、機會主義，經濟上更向右傾和資本主義化，社會上更加階級分化、貧富懸殊、資產階級壯大，中共性質上更中產階級化。官方宣傳說，這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實際上是高層派系權力鬥爭中暫時協調的大會，更是江澤民主張勝利的大會！

2002年12月10日

註釋：

- <1>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的《辭海》對「總體」的解釋。
- <2> 02年11月12日《信報》。
- <3> 11月13日《文匯報》。
- <4> 同註<2>。
- <5> 10月17日《香港經濟日報》。
- <6> 11月16日《星島日報》。
- <7> 10月1日《文匯報》刊載《北京青年報》報道。
- <8> 10月22日《明報》中國經濟版報道。
- <9> 10月8日《信報》。
- <10> 10月18日《信報》。
- <11> 11月12日《蘋果日報》。
- <12> 11月7日《文匯報》。
- <13> 11月11日《信報》。
- <14> 11月11日《明報》。
- <15> 11月6日《明報》。
- <16> 11月15日《經濟日報》。
- <17> 11月19日《文匯報》。



(轉載)

呼籲江澤民全退書

山東大學教授孫文廣

中共中央江澤民總書記：

最近據傳江總退下國家主席和黨總書記後，要繼任軍委主席，對此我有些不同的看法。

我於文革中因現行反革命罪入獄，在獄中先後上書中共中央約五十萬言，評論時政。1981年中共11屆六中全會選舉鄧小平任中央軍委主席。當時我正在濟南勞改隊服刑。在「12大」前我寫了一封信給中共中央，反對鄧任軍委主席，質問這樣做是否違憲？

1978年憲法規定：「武裝力量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率」。按照這條憲法的精神，華國鋒下台後，軍委主席本應由當選的胡耀邦擔任。這也符合中共中央歷來的慣例和中共黨指揮槍的原則。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的憲法只不過是個別人手中的玩物，可以根據最有實權者個人的需要修訂。鄧小平1981年當軍委主席，到了1982年修改憲法時，就將「武裝力量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率」的內容刪除。而且1981年在黨內取消「主席」之名，改稱「總書記」，可能也是爲了擺脫違憲之嫌。

鄧小平在1981年擔任中共軍委主席，1983年擔任國家軍委主席，在他擔任軍委主席期間，實際權力比總書記還要大，他可以操縱、掌控國家大事。國家主席、黨的總書記只要不合他心意，即可撤換。他可以連撤兩任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

國家總理趙紫陽在1989年「六四」前的5月16日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說：「13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要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他還說這是他「第一次」公開透露了中國共產黨的這個「決定」。這也是趙紫陽在明知不久要下台後，向全國人民証實鄧小平以軍委主席之名行「太上皇」之實。「13大」之後鄧小平在黨內連個中央委員都不是，憑什麼國家和黨的最高領導人要根據黨的「決定」必須向他通報重要問題，向他請教？這不是「太上皇」又是什麼？

經過法定程式產生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沒有最高決策權，而名義上只管軍隊的軍委主席卻在國內具有最高的權力。這就是鄧小平創立的「太上皇體制」。

這種體制是一種落後的制度，中國辛亥革命後已經少見，各民主國家則已經絕跡。

有人願當太上皇是因爲：太上皇不但可以滿足權欲，而且可以避免過去犯過的錯誤受到清算。仍有至高無上的地位，難行新政。

當鄧小平擔任軍委主席，處於太上皇地位時，怎能爲1955年的「高饒反黨集團案」平反呢？因爲當年反高饒，鄧小平是有功人員，因爲打「高饒」有功他才在1956年高升爲中共中央總書記、政治局常委。

同樣，無法討論1979年出兵越南，造成數以萬計死傷的責任問題，也不能說1957年「反右」完全是錯了（因爲當年鄧是反右辦公室主任），誰也不能議論6、70年代的「反修」問題，當然討論「六四平反」更是大忌，因爲這些事件，有的是鄧小平深深介入，有的則是他應負主要責任。

民主選舉的領導人不享實權，不經民選的太上皇有無上權力，民主豈不成了一句空話，要民主做甚？按憲法選出的國家領導人不享有法定的權利，法制國家從何談起？講法制作甚？實權掌握在軍委主席手中，這是「軍事政權」的形象，不但名稱不好聽，也給人一種專制，獨裁的印象。

如果上行下效，地方政權也由地方武裝部隊的領導人掌實權，那成何體統？

鑒於歷史的教訓，要廢除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終身制似乎已經取得共識。所以按憲法規定，國家最高領導人都有二屆的最終任期，唯獨軍委主席沒有設最高任期，這是當年爲鄧小平設計的。按這個體制，具有最高權利而又沒有任期的軍委主席就可以一直幹到死在任上，這難道不是新形勢下的一種「終身制」？

「太上皇」實際上是變相的終身制，應該廢除。因爲這種制度會造成政治改革的停滯、社會的停滯。

最近在中共召開「16大」之前，外界盛傳，江澤民二屆期滿要退出主席和總書記職務，但要繼續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也就是說江總可能要以鄧小平爲榜樣，繼續「太上皇體制」。另傳有些人正在勸進。

對此我勸江總是全退爲好，不要再幹軍委主席，

理由如下：江總全退之後可以給繼任者留下充份的活動空間，讓他們放開手腳，解放思想，大膽改革。做好了是他們的功勞，做壞了他們自己承擔責任。有利於培養鍛度最高領導人。一個興旺的國家應該是新人輩出，像俄羅斯的普京，當總統時只有49歲，美國的前任總統也只有五十幾歲，而江總以76歲的高齡謀求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實在與世界潮流相逆。

江總想學小平繼任軍委主席，和鄧小平在軍隊內部的資歷是無法可比的。鄧有赫赫戰功，在軍隊內的資歷和人際關係，都是江總不可比擬的。

而江總如果繼續擔任軍委主席，那麼在最高層如何推行退休制度呢？江總不退，比江總小兩歲的朱鎔基總理到底退還是不退，尉建行等人退還是不退。

據說中央曾經形成共識，70歲以上一律退下，雖說沒有形成「文字」，訂成制度，但是也應該言而有信，誠信為本，免為後人詬病。現在軍內團級、師級、軍級幹部，都明確規定了退休年齡。不到60歲就

要退休，以江總的高齡仍謀求連任，如何能使幹部口服心服？鄧小平掌權時，流傳一個笑話：「80歲老人召集70歲老人開會，討論60歲幹部退休問題」。現在是否又要重演這一幕。而且江總繼任軍委主席要和一批年輕人一起共事，如何消除隔閡，如何越過代溝，都是些問題。

如果江總不顧主流民意強行通過上層運作來當選，也會遇到不少的阻力，比如：黨內會出現反對意見。江總擔任國家最高領導人十幾年，應該是很重視後人評說的，是否連任問題，應該三思後行。

最後奉勸江總書記，莫當21世紀中國的「太上皇」。江總退下來不當軍委主席，對國家對百姓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2002年4月於山東大學

（原載《人民報消息》

<http://www.renminbao.com>）



反對向伊拉克開戰 不為石油或自私流血

羅莫、柯里、米勒

目前政府政策的支持者，所謂主張發動對伊拉克戰爭的知名顧問，似已得到布殊的贊同。從9月對聯合國的演講中，很清楚表明小布殊要完成老布殊在1990-91年對伊拉克的戰爭，使他自成為一個大英雄。不管怎樣，除了些少憲法及國際法問題外，加速戰爭已經與永無止境的反恐怖主義戰爭的現實相進行了。

阿富汗戰爭還沒有結束，美國軍隊仍要駐留一段時間，而且人數也將繼續增加，如同在韓國一樣，結束是遙遠無期，阿蓋達和塔利班並沒有被消滅。阿富汗供給歐洲80%海洛英，當地的盟友都承認，他們不可能也無法制止毒品的流通。卡沙伊（Karzai）總統是如此的脆弱，連自己人的保衛隊都無法建立，而必需依靠美國軍隊當守衛。我們美國的盟友都犯了戰犯的罪行（詳見《新聞週刊》的報道）；我們殘殺平民，以及在該國造成血腥敵人的報復行動，最後這個貧窮的國家仍然沒有得到所答應過的援助。

有人認為，所有這些動亂，美國政府將在轉移另一目標之前，便會將這種混亂的情況澄清，然而在聯合國189個會員國中，近於150會員國就有美國的駐

軍。爲什麼這個會員國在許多國內都分佈它的軍隊呢？這樣的帝國主義擴張是有什麼目的呢？

現在我們已伸展到前蘇聯伊斯蘭教共和國，從黑海到裡海，美國軍隊已經建立基地了。這些戰略及油源豐富的國家是布殊以長期的不斷侵略戰爭爲代價而獲取的成果。

絕大多數的人都正在譴責薩達姆·侯賽因而從不想到他是列根和老布殊執政時期其中一個好朋友。美國納稅人民曾給予億萬元的貸款及支撐他。當他侵略伊朗時，不僅我國駐波斯灣的海軍幫助他，並且供給糧食及有戰略性的衛星情報；對他使用毒氣對付伊朗軍隊的事實保持沉默。布殊／列根還發表聲明，說他在伊拉克北部殘殺庫爾德人的報道，沒有事實根據。

事實上薩達姆過去每次侵犯他的？國都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卻仍是美國的盟友。

當然，許多我們以前的盟友（僅以本拉登和諾里加（Noriega）二人爲例），薩達姆變成我們的敵人，是因爲他太貪婪，欲將整個科威特吞併。

要檢討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是需要更詳盡的篇幅，在此我們只指出當時全世界都是站在我國的陣營。伊拉克不僅爲敵人包圍，而且美國及其盟友可以從土耳其、敘利亞、沙地阿拉伯及海灣等地區進攻。該場戰爭的消耗，我國沒有重大的負擔，幾乎全部費用是由日本，沙地阿拉伯及科威特支付。

現在的情形則大不相同了。敘利亞、沙地阿拉伯、科威特、約旦、卡塔爾都宣佈不支持。進攻伊拉克，美國需要從土耳其侵入北部，用降落傘部隊降落沙漠地帶，和在波斯灣伊拉克領土突出的尖端強行登陸，配合土耳其（它可能殘殺更多無辜的庫爾德人，較少傷害到伊拉克的國民軍）、大不列顛和跟隨以色列的協助。在九月中旬，林斯菲爾德聲言有更多的國家已經暗中同意支持進攻伊拉克，但有誰相信布殊政府公佈的情報有多少真實性呢？

目前我國能夠控制的圈子及得到支持的各方面是狹小很多；由此伊拉克政權很明白布殊的聲明，這一次是很肯定的，這就是說，如果他真的是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侯賽因無需積極去抑制（如果他沒有，那麼在這世界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個十足說謊的獨裁者，如同他侵略科威特時，世界所見到的薩達姆一

樣）。這就意味？更大的美國損失及更多伊拉克人民的死亡。

在目前經濟衰退的情況下，除了戰爭耗費將超過千億美元外，石油價格將隨衝突的發展增加，以及最後，不管能否控制整個伊拉克都必須要美國軍隊長期佔領駐守及美國的援助。此外還有中東、以色列及巴勒斯坦衝突的局勢；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人權被剝奪及民族獨立的權利被否決。不管林斯菲爾德、沃爾夫維茲和柏爾利的聲明，侵略伊拉克將造成該地區不可想像的動亂。現在以色列也保證加入行動，誰知道結局是如何呢？

伊朗和伊拉克現在互相諒解，雖然過去伊朗曾受伊拉克的侵略，千百萬人民被薩達姆的軍隊屠殺，但由於布殊的反「邪惡軸心」政策，他們會測到，附近已經有25萬的軍隊圍集，下一次可能是輪到自己被美國侵犯了。我們不可忘記和忽視，布殊曾允諾可能首先使用核子武器。

面對這樣危險的局勢，我們應該怎麼辦呢？我們必需大聲疾呼：我們不要戰爭。今年是選舉年，對議員及參議員進行個別訪問，公開參加其他團體大眾的反戰遊行示威。

在這退伍軍人日，所有越戰退伍軍人反戰行動會員及支持者應提醒當局，我們繼續要求給予所有退役軍人及戰爭的犧牲者適當的補償福利，不要再當炮灰！

註：

巴里羅莫（Barney Romo）是越戰時的陸軍中尉，

戴夫柯里（Dave Curry）是越戰時反間諜情報陸軍上尉，

米勒（Joe Miller）是東京灣事件發生前夕海軍保安隊員。

三人現均爲全國越戰退伍軍人反戰行動會委員。（柏青譯自越戰退伍軍人反戰行動出版的《退伍軍人》第32卷第二號，2002年秋季號）

美國借9.11建立世界霸權

高文

〔《新左翼評論》資深編輯彼得·高文接受《國際觀點》訪問，討論美國政府在9.11事件後的動作和國際局勢。以下是訪問摘譯〕

問：應該怎樣理解美國的「反恐怖主義之戰」？

答：美國公佈的目的，自然是要打敗「恐怖主義」，推翻「流氓國家」的政權。布殊演講所針對的4支恐怖主義運動和3個流氓國家，其中佔了3支運動和2個國家是支持巴勒斯坦解放鬥爭，也和美國及以色列為敵。美國把箭靶針對在一個地區裡，這反映了她在中東的政治難題十分棘手，因此她希望利用9.11事件為政治後盾，發動國際和國內的動員反對伊拉克，以圖紓解她在該地區的脆弱地位。

美國圖謀確立單一霸權

除了這些戰術目的，美國也企圖藉著9.11事件的「機會，重新塑造國際關係」，美國總參謀長鮑威爾在9.11事件4天後就說到這一點。那個意思，就是重整美國在全球的綱領性目標，利用她壓倒性的軍事力量來固定美國成為「單軸心國」。老布殊政府和克林頓政府之前也是向這個目標致力，而9.11事件給現任政府提供了新機會。

所謂的「反恐怖主義運動」，實際上就是表述了和合理化這個全球單極的目標：凡美國認為是「邪惡」的國家和運動，都要解除武裝，改變政權。希圖避免這種命運的國家，便必須與美國為盟——在世界政治中，再無所謂中立。至於與美國為盟之國，便成為美國的受保護國，須向美國提供利便，讓她向全球擴張。

換言之，布殊政府就是要藉著「反恐運動」來推進世界統治。這個運動對美國最具價值之處，在於它大有道理，也取得國內民眾支持和部份「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支持。

這個運動能否成功，卻是另一回事。美國是否有能力承擔全球性的單極控制，是一個未知之數；她面對著從歐亞、西歐到中國而來的政治戰略挑戰。世界

秩序仍然在過渡之中；自從蘇維埃集團在10年前垮台，世界秩序仍未確定下來。

從幾種對立的世界秩序觀，可以窺見現存的懸空狀態。美國打從1991年波斯灣戰事開始，她的全球觀念就是美國權力至高無上論，由她單方面便可以界定誰友誰敵：侯賽因、米洛塞維奇、塔利班政府和伊朗等，都是敵人，因此便不容有全球性的常理規範。

在美國這種觀念之外，另有兩種主要的對立觀，對於怎樣治理資本主義，持有不同見解。歐洲的世界秩序觀是主張「多邊主義」，由「國際社群」統治，也即是由「七大工業集團國」（G7）和OECD來聯合領導世界。這種觀點和美國的「單邊主義」一樣，也是侵害民族國家的主權，改由G7的意旨行動。從美國看來，歐洲的戰略觀是她的勁敵，會使美國束手束腳。

第三種觀念是由中國、俄國為主而鼓吹，主張由聯合國安理會和聯合國憲章來決定世界秩序。法國、德國在某程度贊成這個觀念，而其他大國如印度也在同一行列。人們不應輕看這個觀念，因為它既被許多國家支持，也在上億人民的意識中享有地位。巴勒斯坦民間反抗運動的能量，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這種觀念的力量和韌力。

問：很明顯的是美國在冷戰勝出。問題是：美國要建立霸權，為何必得訴諸軍事力量？她不可以通過跨國公司來達到這個目的嗎？例如美國公司在電腦技術和大部份微型電子技術方面，在1990年顯而易見的遙遙領先。美國為什麼仍要打仗？例如在巴勒斯坦不斷有戰事，是對美國有利嗎？

答：唯一能肯定的，是資本主義贏了冷戰，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方面大勝，而且，資本主義力量在1990年代是用盡努力來鞏固勝利，以防社會主義捲土重來。不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大國的大公司之間的合作性是非常有限，空談的多而已。帝國主義間的競爭仍然十分激烈，這在歐美之間尤甚。只不過，歐美間不是直接在經濟方面競爭，而卻是在政治形態和政治權威中

心的問題上競爭，而這對歐洲更是個首要問題。

歐美爭逐政治權威

繼冷戰結束，蘇維埃集團垮台，西歐一直力圖希望擺脫作為美國的受保護國，自行建立政治中心，把勢力伸向東面。要是這個圖謀成功，最後便會把歐洲政治中心和資本主義俄國聯結起來。這對美國是個嚴重的威脅。

在東亞也存在相似的風險：開放、冒起的中國將成為「東南亞國家聯盟」地區上的政治經濟中心，以至把南韓和日本也納入其中。要是東西歐和歐亞在全球性的政治問題上採取相近的路線，那就會成為對美國勢力的重大挑戰。

簡言之，蘇維埃集團之垮台產生了一個吊詭而互相矛盾的效應：它既使美國成為壓倒性的軍事霸權，同時又侵害美國在資本主義核心國確立的冷戰保護國制度。這個矛盾性就是當前世界政治和美國大部份對外戰略的驅動力。

許多人把這些政治較量看為次要，認為經濟和「全球化」才是要題。據他們看，「全球化」就是產生一個相當統一和自主的世界市場，而各大國的跨國公司就在這個市場中訂規則，剝削全世界；至於國與國和它們在政治之間的敵對性，則是退居次位。

從南北關係來看，這個圖象有相當的真實性；歐美是在聯手，強行把剝削性的安排套落南方。但我們必須記著，由美國勢力塑造的全球資本主義的結構模式，其創造價值和實現價值的大中心，在1945年以後都是處在資本主義核心之內，而這個核心又非常重要的擴展到東方和東南亞「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爭奪資本主義霸權的戰事，就是在這個核心內展開。正是在這裡，對於由資本主義市場規律自動運作的接受性，實際上是有限和不堪一擊的。實際上，經濟體制在很大程度上建基在種種政治妥協和壓力上，而不是建基在「經濟全球化」的鼓吹者的主張。

從1980年代以來，歐美的共同計劃把經濟之政治化遮掩下去。這個共同計劃，就是由資本推行的跨國界的新自由派行動：打擊勞工。所以，乍看起來，跨國統治階級在各方面都聯合一致。但這是錯誤的看法。各個民族資產階級只是在共同的戰術上聯合，那就是撤去本國的社會權利，削弱本國勞工的政治力量，增加對本國勞工的剝削。每個核心國為鞏固民族資本，面臨下列選擇：通過剝削本國勞工，或剝削外

圍國家，或剝削其他核心資本主義國家。在1990年代的歐洲，前兩者是最便捷之路，盡可以利用東歐和中歐積弱之利。不過，西歐資本主義刻下在為未來尋找其他可能。它們聯手起來為資本主義大合奏，尋求通過歐羅區而建立地區保護盾，使它們在稍後能夠抵抗美國資本主義，甚至能夠向歐洲勞工的挑戰作出讓步。

美國冷戰結構陷入難關

最關鍵的一點在此：美國資本主義在冷戰期間發展起來的整體結構，實際上是很依賴一個特定的全球性的政治結構，總括來說，那就是美國在全部資本主義核心國維繫的保護國制度。正是這個政治支配支撐著美元，締造了由美元——華爾街體制管治著國際貨幣和金融關係的基礎，使美國能和全世界一道經營龐大的赤字，有經費償付軍事保護國的結構，運用軍事——政治和經濟手腕來塑造以美國利益為上的資本積累。換言之，要是其他核心受保護國發展出另一種更簇新先進的資本貨物來支撐新一輪的積累，美國的這個結構是可以介入，把它幹掉。馬克思主義者們傾向於看輕國際資本主義政治這一方面。

正是在這種狀況下，我們看到，要是東西歐和歐亞的政治地域主義發展起來，那對美國資本主義會是多麼的危險。

資本主義核心國看似在「全球化」上聯合，這反映了新自由派共同都向勞工進攻。而我們不應把向南方的新一輪擴張和邁向「金融化」的趨勢，看成是金融資本壓倒產業資本，因為那毋寧是大公司向金融部門的轉化，從金融運作贏取大宗利潤。若把眼界落到生產和所有權的地理分佈，就會有不同的景象：金融極之強烈的地域化——在每個主要地區：北美洲、歐洲和東亞——正走向更加地域性。在這三個地區，90%的消費都出產自該處，而且所有權的分佈也是一樣。

在歐洲，生產方面的地域主義是和政治上強烈的地域主義相結合的；這在東亞也有相同的聳動。東亞這方面的發展會比歐洲較為脆弱，這尤其是因為中國和日本競逐領導地位。美國的精英也同樣嘗試建立泛美區，只不過美國也同時要對歐亞重組政治控制了吧。

伊拉克問題具決定性

問：什麼會妨礙美國這一次新攻勢？

答：美國外交當局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印度大陸的局勢，及印度和巴基斯坦會不會爆發一場無法控制的戰爭；這對美國是最巨大的危險。美國難以把巴基斯坦穩定下來。

對美國的第二大考驗是伊拉克。美國把自己制肘在非要把這個政權推翻不可。美國能夠做到這點而又不使中東的動盪惡化嗎？美國倘若能夠做到，會是一次重大的全球勝利，尤其會壓倒歐洲。這也將使美國更改對沙特阿拉伯的政策（其目標是撤軍）。美國倘然做不到，便會麻煩叢生，而布殊的整套策略亦行將解體。

第三，阿富汗的局勢對美國而言仍是個險著。要是阿富汗當前的虛擬政府公開破產，美國便將要付出嚴峻的代價，並且也會使阿富汗陷入混戰。

不過，最關鍵的考驗，仍將是伊拉克；這方面的失敗，將使美國的「反恐運動」之作爲全球性的戰略方策一敗塗地。除非美國首先在以色列、巴勒斯坦方面達成交易，否則無法成功。

伊拉克的衝突對歐洲也是一場大考驗。迄今爲止，歐洲的戰略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它們事事追隨美國，但從中又上下其手，加緊本身的內聚力和自主性。這一次，在伊拉克問題上，將會使歐洲分裂。

問：左派在當前形勢的前景是怎麼樣？

答：反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由於很大程度上是在社會和經濟政策方面統合，而不是對世界政治秩序的關鍵問題具有一個綱領，所以，9.11事件使運動有所退卻。反全球化運動對布殊向阿富汗開戰及發動「反恐運動」，沒有政治上的準備。結果是這個運動在美國嚴重退卻，而在其他地方，儘管未至那麼嚴重，但也同樣受到打擊。說實在話，一個有原則的平權社會自由主義是應該準備迎接這個運動各項主要的社會政策目標，不過，它同時也會對美國國家的性質，以及她對阿富汗戰爭、向伊拉克開戰的真實目的和後果，在認知方面會懷有幻想。在自由派的眼中，既會把跨国公司看爲問題的泉源，同時又會把西方國家看爲是人民意願的基本表述。

這樣一來，對西方國家的侵略行爲的效能和合法性，便普遍存有幻想。不過，另一方面，布殊政府的行動和言詞，對世界各地的自由派和社會民主派產生

了深刻的意識形態衝擊。人們對於罔顧國際法，赤裸裸地推進對世界的控制，真心實意的警覺起來。這便爲國際主義者和反帝國主義左派提供了聽眾，但同時也是對他們的挑戰，因爲歐盟的自由派外交家輕而易舉的，就能將這個問題納入他們的世界秩序觀。他們會說這個世界需要法治，而不是任意妄爲，應該恪守國際法，懲罰犯事者，待到事不得已，才應動用武力。但這個國際法和聯合國，不過是資本主義規則的代號！

繼9.11事件後，左派必須對全球的政治秩序發言，並且發動運動，爭取一個正面、有原則而且認受性的全球政治秩序的基礎，反對美國意欲統治世界的不軌企圖，也反對歐洲提出的所謂「國際社群」，因爲它實際上是由G7和OCED的資本主義來統治。

中國人民面臨重大挑戰

問：要使世界勞工沒有發生重大發展，沒有大量局部門爭來創出新局面，這是談何容易。而在這方面，可以看到許多正面的跡象，例如，在巴西的阿雷格里市，在9.11之後召開了一個有7萬人參加的「世界社會論壇」。

答：我同意。在這一點上，我認爲，「世界社會論壇」的發展和聯繫若能推展到東亞，尤其是東亞的勞工運動，是最爲關鍵的。迄今爲止，「世界社會論壇」主要是在歐洲和美國有最強的聯繫。在接下來的階段，這是對左派最重要的戰略任務。在東亞國家出現一個強大、獨立和激進的工人運動，將會是扭轉力量關係的一個巨大因素；在這方面，菲律賓、印尼和南韓才是剛剛開始有新左派和工會組織。

而當然也要和日本，尤其是中國的勞工建立聯繫。佔了全世界人類很大部份的中國人民，正在登上世界舞台。當中國在世界經濟體制中不可避免地周旋之際，還有國內的動盪和難關，中國人民面對著來自美國的重大威脅，面臨重大考驗。要是「世界社會論壇」周圍的力量能夠和中國勞工潛在的浩大力量聯繫起來，則不僅拉登，甚至是美國軍事硬件的政治能力，看來也是不一樣的了！

（史丹摘譯自《國際觀點》2002年4月號）

美國最終目標是統治全世界

斯托克頓

1971年蘇聯解體之後，美國在克林頓及其前任政府管轄下，作為一個僅有的超級大國，還只是追求相對地統治世界。如今在小布殊統治下，美國卻力圖建立絕對統治世界的霸權了。

布殊政府有意要使它的帝國主義伙伴以及半殖民地朋友都要屈從於它，同時，還要摧毀現有敵人和潛在敵人的反抗勢力。進攻伊拉克，改變其政權，扶植傀儡政府，都將大大有助於實現這項計劃。美帝國主義作為一個單邊行動的強國，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而且要迫使各國在它面前打躬作揖。

美國的新、老盟國，其中包括歐盟、俄羅斯、中國、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國，正在盡一切力量通過聯合國和國際外交手段去改變布殊的行動路線。甚至布殊的忠實盟友布萊爾也正在設法使美國遵循聯合國程序，以便使他不至於去支持美國的單邊進攻行動，或參加受到一切世界其他大國譴責的美英大合唱。

這不僅因為上述這些國家，在伊拉克及其周邊國家有切身利益（如果美國一旦佔領伊拉克，它們就會失去一切），而且還因為這些大國不希望看到美國建立世界新秩序。

這種世界新秩序建成了，必定迫使其他帝國主義大國完全服從美國的單邊行動，拒絕接受「國際法」的約束，不遵守任何條約（除了有利於美國的條約之外），並且還會先發制人地進攻那些它認為會威脅到美國安全的其他國家。

去年的阿富汗之戰，旨在擴大美國在中亞的基地及其附庸國，並確保美國在中亞地區的軍事上和經濟上的統治地位。

美國在軍事上的戰略目標，是獲得空軍基地及其附庸國，並進一步削弱和包圍像俄羅斯，中國這樣的潛在敵人。在經濟上的戰略目標則是為美國一手控制的國際財團掌握這個地區的石油礦藏量。

至於伊拉克，是美國要爭奪的更大目標。如果伊拉克成為美國的衛星國，美國就可統治整個海灣地區，一旦它的石油工業得以重建，這便會給OPEC原油輸出國組織以致命打擊。

卡特總統的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早在二十世紀90年代便提出地緣戰略方針，即建立全球性美利堅

「王國」，但他堅持這必須建立在有壓倒性軍事優勢基礎上。他說，美國這一「圓拱形工程」目標必須要使我們的附庸國永遠處於附庸地位，並要防止那些野蠻國家聯合起來。

小布殊的安全顧問賴斯女士，坦率地洩露了政府的意圖。她說：「九·一一事件給美國帶來「歷史新時期」，這個時期類似於1945-47年美國所面臨的局面，給美國提供了難以置信的機會，即「抓住時機，重塑世界」。

這個論點，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以及其他官員等都是同樣贊賞的。

機遇果真來到了!?

九·一一事件果真給美國統治階級帶來了黃金時機。過去有過各種借口：共和黨的孤立主義，民主黨的「多邊主義」，現在，所有這一切都要讓位於美國在各大洲那具有侵略性的單邊利益的追求政策了。

實質上的最後通牒，美國同時向其盟國和敵人提出來。伊拉克要「改變政權」，被佔領的巴勒斯坦人要：「重新組織」政府，選擇一個屈從於美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以色列的新領導人。放縱沙龍對它們肆意侮辱，直到它們屈服為止。

聯合國已不在美國眼中。布殊告訴聯合國，如果美國的要求得不到它的合法認可，美國就可把聯合國的身份降低到像戰前的國際聯盟一樣，只不過是歷史的垃圾堆。

布殊警告說：「凡是不支持我們的，便是反對我們。」他警告俄羅斯，中國，法國不應在安理會上使用否決權來處理伊拉克問題。他同時警告德國，認為施羅德總理公開反對進攻伊拉克，業已毒化了美德關係。拉姆斯菲爾德，說得更清楚，要使那些不支持侵略伊拉克的國家，一概置之不顧，它們的現有債務、合同和投資將一筆勾銷。

新「布殊主義」申明，不論何時、何地，只要美國認為明顯地存在著對它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的威脅時，它就有特權發動一場「預防性」戰爭。當然，美國將會利用聯合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特種聯盟作為幌子，但是決不會受這些機構的觀點和決議的約

束。這就等於撕毀了1945年後國際法的思想體系。

按照布熱津斯基的說法，美國把下列這些大國作爲它的主要附庸國，其中包括俄羅斯、中國及歐盟主要成員國，因爲這些國家面積大，擁有核武器，而且其中一些國家佔有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位置，它們每年召開的年會是相當重要的，但沒有一個國家能在軍事上頂得住美國。

其次，是發達的半殖民地國家，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尼日利亞、南非、土耳其、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印度。由於這些國家在經濟和軍事上的重要性，其中有幾國還擁有核武器，因此還享有一定地位。但它們彼此之間相互競爭，都希望成爲特定地區的，次等——帝國主義霸權國，或充當美帝國特許憲兵。美國則要嚴格地控制它們，使它們成爲馴服的附庸國。

再其次便是一大批弱小國家，布熱津斯基稱其爲「野蠻國」，「野蠻國」的底層便是歸入流氓國之列的阿富汗、北朝鮮、伊朗、蘇丹、索馬里、也門、前南斯拉夫諸國，當然包括伊拉克在內。美國要對這些國家進行干涉，使其成爲名實相符的殖民地國家。

美國發起的世界王國運動，實質上是超級公司全球化在軍事上、政治上的反映。這些超級公司已經統治世界達十年以上了。但統治世界還不是既成事實，而只是運動在發展中的國格。全球化運動——這是由克林頓和布殊、梅傑和布萊爾、葉利欽和普京發動的——在世界的主要統治階級之間還不是公開地相互爭奪。但美國追求全球統治，必會驅使歐洲及東亞大國把力量聯合起來，試圖抑制或挫敗美國。

真正可畏的力量在那裡？

很少國家敢於同美國公開衝突，而大多數國家更害怕美國統治中東。日本、中國、南朝鮮擔心的是：美國在東亞駐軍35萬，時時有可能挑動對北朝鮮戰爭。反過來，美國所擔心的是：它的敵對大國在外交戰線上聯合起來反對它，伊拉克問題是一次重大的試驗。如果敵對大國否定聯合國授權給美國進攻伊拉克，那麼布殊政府是否會搶先一步，完全採取單邊行動呢？但戰爭並非單靠軍隊便可以發動的，還需要支持，至少需要國內人民的消極默許。

現在以及未來一段時期內，美國所害怕的唯一敵手是聯合起來的歐盟國家。但它不構成軍事上的威脅。美國譏笑歐盟是軍事上的低能兒，經濟上的老頑固。這因爲歐盟不可能發展成爲與美國相對抗的歐洲聯邦，事實是歐洲不可能有一個聯合起來的資產階

級。但未來的十年中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反美集團會聯合起來反對美國統治世界的霸權主義。這整個過程將因經濟危機而加速，並使資本主義體制心臟地區的經濟停滯期越益延長。不久前，阿根廷出現了經濟危機，接著巴西，南朝鮮或印度也都跟上來了。在這種情況下，即令國際貨幣基金會組織和美國迅速地作出部署，也是徒勞無功的。

但是，反對美國統治世界的鬥爭，不能期待歐盟或東亞大國的反霸權主義，並且這樣做，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第三次帝國主義大戰——一次破壞性無法估量的大戰。也不可能出現「周邊反核心」，「鄉村反城鎮」的革命希望。

能夠最終打敗美國、它的歐盟敵手以及每個國家裡的代理人的，是一次世界革命運動，這場革命可把世界資本主義王國內部的「敵人」動員起來，削弱並最終推翻帝國主義。這樣一切鬥爭只能由全世界的勞動人民及其盟友一起來進行。

大規模的群眾鬥爭，已在阿根廷、巴西、南非和南朝鮮發動起來了。歐洲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在意大利的熱那亞市發展到頂峰。九·二八示威以後的英國反戰運動，同樣成爲了群眾運動。

美國統治者——億萬富翁，同樣有其內部敵人——產業工人、服務業工人、黑人、拉丁美洲人、共產主義者以及被譏爲「下等階級」的勞動者，構成了美國絕大部份人口，唯有他們才能打敗布殊及其超級公司代理人。

掠奪成性的布殊——布萊爾侵略政策，已經全面撕破了從全球化和世界新秩序中出現的和平、繁榮、普遍民主的面紗了。廣大群眾已越來越仇恨資本主義制度，以革命來反對資本主義又一次地提上議事日程。

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這兩個詞語又一次地溜到人民嘴邊了。但缺乏的是人們還不理解用什麼來代替資本主義以及採取何種戰略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需要懂得的不僅是創造另一世界是可能的，而且還要懂得那是什麼樣的世界。現在我們更需要再一次把社會主義和階級鬥爭深入到千萬人的心中去。

緊緊抓住當前有利條件，大力開展群眾運動。

（蕭明節譯自《工人力量》2002年10月號）

從日本銀行買私營銀行股份看日本金融危機

高島義一

今年9月18日，日本（中央）銀行召開政策委員會會議，爲了避免越來越深刻的金融危機，決定直接買進私營銀行的股份。這意味著日本銀行不惜以中央銀行的財務健全性以及日元這個國際通貨的信任性下降爲代價，把日本的國有資金投入，以支撐股票市場。這是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政策，由中央銀行操縱股票市場，雖然可以一時延緩金融危機的爆發，但會加重股票、債券與日元通貨同時暴跌的危機，顯示日本經濟已進入走投無路的死胡同。

與世界股市全面下跌同樣，日經平均股票價格在9月以來跌破8千日元大關，回到20年前的水平。各大銀行的股票損失早已超過4萬億日元，根本不可能決算。特別是銀行界必須按照國際決算銀行的新基準在04年9月爲止減少股份在「中核自身資本」（資本金等）以下，這迫使銀行要大量賣出與大企業的相互持有股份，必將導致股市的進一步下落。

今年3月底時，12家大銀行的股票價值爲25.6萬億日元，「中核自身資本」爲17.3萬億日元，有8.3萬億日元的股票必須賣出。但是，如果銀行把持有的臨近破產的大企業的股票拋出，只會加速這些企業的破產，更降低股市，使銀行的股票損失更加重，陷入1997年的金融危機的惡性循環。而且，這些銀行股

份找不到買主。

日本在今年1月曾設立「銀行等股份買進機構」，準備4萬億日元消化銀行放出的股份。不過，爲了防止股市過份下跌帶來的損失，銀行必須支付賣出股票價格的8%。這使得銀行不情願賣給這個政府機構。這一次的決定，取消了這個8%的支付條件，當然受到銀行界的歡迎。日本銀行準備以國有資金填補虧損，並放置10年不會賣出。正如《每日新聞》、《朝日新聞》等媒體9月19日的評論所示，這實際上是強迫全體國民分擔股市危機的「殺手?」，已經違反《日本銀行法》的規定了。

實際上，日本銀行早已喪失了中央銀行的立場與功能，在用盡了減低利息（已經爲零了）、每月購入1萬億日元國債等等手段後，再開始買進明知在下跌的股票，把日本國家推向破產。可以預想，超過30萬億日元的國債發行必將導致國債暴跌，引發持有大量國債的銀行的危機，促使大量資金週轉短缺的企業連鎖地破產，把普通民眾強制推到更底層的失業與貧困狀況中。

（趙京節譯自新時代社《橋樑》周刊2002年9月30日號）

戰爭國家體制改革突進
小泉政權加速經濟破局



繁榮之後的經濟：一個診斷

布勒納著 兆立譯

〔譯者按：本文作者Robert Brenner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大學經濟史教授，曾經是近年有關於當代資本主義動力的爭論的一個中心人物。他在這篇研究美國經濟的長文中，認為美國經濟擴張時期已經過去，「在中期之內很難避免停滯和緩慢增長，或者甚至更壞的情況。」……〕

前言

長時間的美國經濟膨脹已經終止了。不管目前經濟衰退的結局如何，回復到90年代下半期的繁榮情況的機會是非常微小。要在中期之內避免停滯、慢增長或者更壞的情況，恐怕是很困難了。

世界經濟，包括它的主要組成部份美國經濟在內，看來是面對著相當黯淡的前景，其理由，歸根究底說來，就是它在90年代的膨脹期當中無法明確地超越那個從7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初折磨著它的長期經濟下降趨勢（economic downturn）。生產能力過剩（over-capacity）和生產過剩（over-production），導致國際製造業獲利能力減低（再加上政府和各公司要妥善地解決此問題的幾次企圖失敗），在基本上一直應該對全系統範圍的繼續停滯負責任。而且現在還沒有跡象清楚顯示這個問題已經得到解決。1965到73年之間利潤率的尖銳下降，以及它之無法復甦，導致以後二十年內大部份世界經濟中的投資和產量的增長放慢，造成生產力和工資增長的減低，以及高水平的失業。

製造業的利潤率在1985至95年之間有意義的升高，確實在開頭為90年代的美國繁榮提供了真實的基礎。但是，在90年代上半段期間，美國獲利能力升高和最終發生的美國經濟增長，是與先進資本主義世界大部份其他地方、包括日本和西歐在內的獲利能力下降及深刻衰退同時發生的，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是前者引起了後者。

大部份先進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顯著放緩以及接著而來的破壞性危機的威脅，迫使美國政策在1995年把美元從弱勢到強勢的基本改變。這個改變反過來限制了美國經濟的急劇上升。因此，在90年代整個下半段期間，製造業的利潤下降了很多，以此成為美國經濟復興的重要基礎。

但是，恰恰在公司的獲利能力開始在1995至2000年下降的時候，股票市場卻不顧這個下降，在其歷史上

最大的猛漲中起飛了，大量地——而且靠著升值的美元——增加了公司資產的賬面價格。就這樣，上升的股票價格的「財富效應」（wealth effect）代替了製造業獲利能力的復甦，作為經濟的主要發動機。各公司發現，它們的超值股票給了它們享用幾乎無限量資金的机会。它們以此為基礎，才能夠支撐一個強有力的投資繁榮，90年代的膨脹才能夠繼續。

然而，一方面有上升的股價、加速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有獲利能力的下降，這兩者之間日益增大的差距不能夠長久持續。從2000年中開始，一個又一個曾經帶領過這次繁榮的公司，特別是在技術、媒介和電信三行業的公司，面臨災難性的利潤下降，於是，股票市場暴跌了。上升股價的財富效應，現在往反方向走了：各公司發現，籌措資金比以前困難，所以被迫削減投資，使經濟走下坡路。

但是，首要的問題是，公司在股票市場猛漲時所積累的龐大過剩生產能力，因為在那個時期中它們可以利用高度增加的賬面財富大量地增加工廠和設備。這些增添根本不能用它們的回報率來證明是正當的，因為利潤率已經在下降。過多的生產能力導致過多的生產，而公司卻不能夠以可使它們獲得合適利潤（如果有利潤的話）的價格賣出它們的產品。

製造業的獲利能力，在1997至2000年之間已經有了很大的跌落，在2000-2001年更猛跌了，使整個製造業走向深刻的危機。這就啟動了古典的下轉螺旋：投資減少（生產資料定單的減少）造成失業率上升，失業率上升引致消費需求減少，消費需求減少導向破產和壞賬增多，破產、壞賬增多又向投資施加減少的壓力，等等。

當美國的經濟衰退加深時，美國需求的增長就劇降了，而世界經濟的其餘部份，由於深深依賴美國的進口，也跟著美國走下坡路。當國際經濟收縮時，美國出口的增長就急劇下降，加深了美國經濟的下降趨勢。一個互相增強的國際性下降趨勢接著而來了，使美國的投資和經濟增長率從1999年中—2000年中的這一年到從2000年中—2001年中的這一年的下跌成為美國戰後歷史上最大的一次。

2001年，美國聯邦儲備局以破記錄的速度將利率降低到史無前例的水平。因此，家庭借債急烈增加了，使消費者繼續快速地增加他們的消費。公司因此被鼓勵

恢復投資。這個令人吃驚的經濟失控狀態至少在目前已被抑止，而國內生產總值在2002年首季顯著地升高了。

然而，公司的獲利能力仍然停留在幾乎是二十年來的最低水平，投資繼續令人擔心地猛跌，出口和貿易/往來帳戶逆差繼續處於危機中，而股市行情——反映了以上這些情況——仍然無法回升。因此，結局如何仍然無法確定。這篇論文的任務是，幫助讀者更明確地瞭解下一階段可能發生的事情。

關於這次繁榮的傳奇：官方的說法

關於美國這次繁榮的標準說法是以「新經濟」(New Economy)為其出發點的。它的焦點是放在美國經濟的所謂獨特創造能力(unique genius)上。它的含意是，只要其他國家按照美國模式去做，世界經濟各種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然而，這個說法之所以能夠得出如此玫瑰色的圖畫，是因為(1)它只看到從95年到2000年這五個繁榮年頭，不考慮其歷史背景，也不作歷史性比較；(2)它忽視了這些繁榮年頭的致命內在弱點；(3)它把美國經濟從整個世界經濟中抽象出來看，其實，美國經濟與整個世界經濟有分不開的聯繫，而後者的問題終於會把前者拖垮。

新經濟之作為股市猛漲的指導思想

根據官方的說法，根據這個被神聖地放置在經濟顧問委員會在2001年初所發佈的《總統2001年經濟報告》和〔美國聯邦儲備局局長〕艾倫·格林斯潘的多次演說中的官方說法，美國經濟依仗它的公開市場、它的企業家/財政機構——特別是它的高度發展的風險資本公司、它的高技術新興公司、尤其是它的股票市場——來發動一場信息技術方面劃時代的革命，明確地與長期下降趨勢決裂。根據這個說法，1970、80年代的長期停滯、生產力增長的長期放慢，是創造發明在戰後繁榮期之後突然(未被解釋地、毫無根據地)枯萎的結果。可是，隨著「新經濟」的各種技術突然(也是未被解釋地、毫無根據地)在90年代初出現，那些能夠動員必要的「無形資本」——例如創造力、技能和組織力等等——的公司就有前所未有的獲利機會了。當高風險高技術的新興公司股票在首次公開發行售給願意高價購買這些有可能無限期獲利的信息技術企業股份的熱心投資者時，根據這個官方說法，風險資本公司就會因這些高科技新興公司巨大的獲利潛力而向它們提供資金。銀行為了同樣理由也願意向這些高風險企業提供貸款。

正如聯儲局局長格林斯潘從不厭倦地解釋的，對新經濟生產力增長的指望，提高了預期的利潤率，推高了股市。公司的上漲的股價容許它們——特別是那些在技術、媒介和電信方面的公司——有更容易享用資金的機

會，使它們能夠增加投資(「財富效應」)。更快速的資本積累可使技術更加向前躍進，使生產力增長更大。後者提高了潛在的利潤，因而是股價，因而是更多的投資，形成了格林斯潘局長所說的以股市和風險資本為中心的經濟擴張的「良性循環」。

根據這個說法，Netscape公司股票在1995年8月首次公開發行中創立的驚人成果，顯示了新經濟的巨大潛力。它因此啟動了股市猛漲和經濟繁榮這兩者之間互相支持的局面。股票市場與真實經濟之間的這種增效作用(synergy)，產生了經濟顧問委員會所堅稱的1995-2000年的「非凡成績」(《總統2001年經濟報告》，第23頁)。

由泡沫驅動的繁榮

事實上，自從長期停滯在1973年開始以來，美國經濟的成績，在從1995到2000年的繁榮高潮期間，雖然比任何其他五年期為好，但不是非凡的。根據常用的指數，美國經濟在1995至2000年這五年的成績沒有比1948至1973年這二十五年的成績好多少，就生產力增長這個能使美國經濟突破的泉源而言，還差了15%(見下表)。

美國經濟：

1948-1973年與1995-2000年的比較
(除失業率外，其他數字都是平均年百分比增加)

	1948-1973	1995-2000
國內生產總值	4.0	4.1
非農企業淨股本	3.5	3.8
非農企業生產力	2.9	2.5
非農企業實際每小時工資	2.8	2.0
通脹/消費品物價指數	2.4	2.4
平均失業率	4.2	4.7

還有，假如美國90年代的繁榮具有堅實的基礎，證明能夠持續的話，它也許已經明確地在國內及國際上超越了長期的下降趨勢。但是，關於美國的經濟擴張，特別是關於從1995年一直到2000年的擴張，突出的事實是，它比以往更依靠股市的猛漲，並不是後者依靠前者，因為這個擴張是在利潤率無法提高的情況下進行的。美國特有的企業家——財政機構，在美國聯儲局必不可少的援助下，與其說製造了繁榮，不如說製造了泡沫。

風險資本公司確實提供了大量資金給高技術新興公司。但是，在90年代最後幾年之前，也就是在股市高漲接近高峰之前，它們所出的資金是非常有限的。在股市接近高峰的那幾年，它們不必依仗這些新興公司的實際生產潛力或者微不足道的獲利能力來獲利。它們可以從

這些新興公司的股票，在首次公開發售中所產生的瘋狂飛漲的贏利中獲取利潤（《總統2001年經濟報告》）。

股票投資者，更一般地說來，確實以購買股票的方式，向一些新興公司和其他較老牌信息技術公司，提供資金。但是，他們之所以這樣做，並不是因為這些公司曾經憑藉它們的高科技而產生高額利潤，而是因為這些公司的股價正被投機行動炒高到雲霄。大多數電子商務公司（e-business）從來沒賺過一分錢；甚至佔據「新經濟」中心的主要技術、媒介、電信公司也沒賺過與其股價相符的利潤。

各公司確實發動了一場巨大的投資狂潮，而且因此提高了生產力的增長。可是，它們之所以能夠這樣做，只是因為它們的飛漲了的股價使它們極易籌措資金，並不是因為「新經濟」提高了它們的獲利能力。股價與利潤之間日益增大的差距，立刻驅動了這個擴張構成了它的致命缺陷，而且在2000-2001年抑止了這個擴張。這一點下面將再討論到。

最後分析起來，美國經濟之無法在2001年中以後仍然保持它的獲利能力和衝力，是因為它一直與一個停滯不前的環球經濟無可擺脫地糾纏在一起。這個停滯是因為生產能力過剩和生產過剩的久存和加劇。整個制度及其美國部份的根本弱點，可從以下事實中看出：在90年代的商業周期期間，整個先進資本主義的經濟表現，不論用那一標準尺度——GDP增長、人均收入、勞動生產力、實在工資和失業率——來測量，都比不上80年代。1989年代的經濟表現比不上70年代，而後者又達不到1960、1950年代的水平。（見下表）。

遞減的經濟動力

（年平均百分比變化）

	60-69	69-79	79-90	90-95	95-00	90-00
--	-------	-------	-------	-------	-------	-------

國內生產總值

美國	4.6	3.3	2.9	2.4	4.1	3.2
日本	10.2	5.2	4.6	1.7	0.8	1.3
德國	4.4	3.6	2.15	2	1.7	1.9
歐洲12國	5.3	3.7	2.4	1.6	2.5	2
7強	5.1	3.6	3	2.5	1.9	3.1

人均生產總值

美國	3.3	2.5	1.9	1.3	3.4	2.4
日本	9	3.4	4	1.1	1.1	1.1
德國	3.5	2.8	1.9	7	1.6	4.3
7強	3.8	2.1	1.9	1.2	2.5	1.8

勞動生產力——總體經濟（GDP/工人）

美國	2.5	1.3	1.2	1.2	2.3	1.8
日本	8.6	4.4	3	0.7	1.2	0.99
德國	4.3	3	1.5	2.1	1.2	1.7
歐洲11國	5.2	3.2	1.9	1.9	1.3	1.6
7強	4.8 (60-73)	2.8 (73-79)	2.55	1.7		

實際報酬——總體經濟（每一員工）

美國	9.7	2.7	0.7	0.6	1.9	1.3
日本	7.3	5	1.6	0.8	0.2	0.5
德國	5.1	4.3	1.1	2	-0.1	0.95
歐洲11國	5.6	4	0.8	1	0.3	0.6

非住宅用的股本（私營企業）

美國（淨）	3.9	3.8	3	2	3.8	2.9
日本（總）	11.3	9.5	6.9	4.5	5.3	5
德國（總）	6.6	4.5	3	3.1		
7強（總）	4.8	4.6	3.9			

失業率

美國	4.8	6.21	7.1	5.9	4.6	5.25
日本	1.4	1.7	2.5	2.9	4.1	3.5
德國	0.8	2.05	5.8	8.2	8.6	8.2
歐洲15國	2.3	4.6	9.1	9.8	9.9	9.9
7強	3.1	4.9	6.8	6.7	6.4	6.6

資料來源：

OECD，歷史統計，1960-1995，巴黎，1995年，表2、15、3.1、3.2；

歐洲經濟的「統治附件」，第71號，2000年，表11、31、32；

OECD經濟前景，第67號，2001年，附件，表21；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前景，華盛頓D.C.，2001年5月，數據庫，表1及4；Armstrong等人，《1945年以來的資本主義》，第356頁，表A6。

以另一角度來說明這點：恰恰在新自由主義、市場授權的各種措施在大約1980年以後比以前更全面推行的時候，資本主義核心地區的經濟卻日益不能滿足要求，特別是對於它的廣大群眾。就整個先進資本主義世界而言，在剛過去的十年中，工資的增長跌落到戰後最低水平，（美國以外的）失業率盤旋在或接近戰後高峰，而福利國家在緊縮中，雖然每個國家的緊縮速度不同。不管由泡沫推動的美國繁榮人工地給了世界經濟多大的刺激，以上所有這些仍是不爭的事實。

1985-95年美國的復甦和國際上的停滯

因為全球經濟在過去十年間證明是不能決定性地超越長期下降趨勢，這個長期下降趨勢必須繼續成為了解它的最近和未來走向的出發點。在這方面，真實的故事是或多或少地朝向與官方說法不同的方向走的。例如，現在很少有證據顯示科技進展的速度和新發明出現的頻繁在1970、80年代期間減少了。可是，在這些年中，有無可辯駁的證據指明獲利能力，特別是在美國和國際製造業中，持續地、深度地減低了。後者與資本積累的長期減慢有很大關係，所以投資減慢才是發明和生產力增長的長期、全面減慢的主因。

長期的下降趨勢

簡短、圖式地說來，在60年代後期、70年代初期，國際競爭的加劇，特別是由於日本、西歐的較廉價生產品日益增多地輸入，結束了戰後的長期繁榮。它以走向全制度範圍內的生產能力過剩、生產過剩以及主要是製造業利潤率下降來結束戰後的長期繁榮。全制度範圍的製造業利潤率下降，是整個先進資本主義經濟的獲利能力大大地衰退的主因。製造業利潤率的劇降首先在60年代下半期襲擊美國，然後使七強（G7）的製造業總獲利能力降低。隨著70年代初美元深刻貶值和日圓、德國馬克相應升值，日本和德國終於肩負了這個總獲利能力下降的極大部份。

在整個70年代期間，生產能力過剩和生產過剩事實上變得更嚴重了。世界經濟中的各種公司以加緊投資在本行、不轉移到新行業來試圖解決獲利能力和競爭方面的問題。這是因為它們擁有大量無法運用到其他行業的「專用資本」——與供應廠商、顧客的聯繫和尤其是技術能力。

但是，以上結果卻是原先問題的再產生和加深。在這同時，以東亞——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巴西、墨西哥等國——新發展中經濟為基地的公司，發現它們可以不管生產能力過剩，製出某些行業的產品，獲得利潤。這就加劇了原先情況。只有在整個70年代實施了凱恩斯主義赤字開支政策對需求提供公共補助之後，才阻止了深刻危機的開始。

在80年代初期，為了抗拒通貨膨脹和使利潤率回升，美國和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試圖以引進高利率和深度緊縮來抗衡本是凱恩斯主義時代遺產的國際性生產能力過剩和生產過剩。這些措施的目的，首先是以增加失業人數來減低工資的增長，其次是要把一大批限制獲利能力增高的高成本、低利潤的生產資料趕出市場。然而，實施了這些措施的立即後果，是債務危機在第三世界的爆發，再加上嚴重的經濟衰退，這些經濟衰退有

使美國發生蕭條的威脅。凱恩斯主義以列根總統的龐大軍事開支和對富人減稅的形式，不得不再度被引進來。

當時在美國盛行的這個緊縮銀根與龐大政府赤字的結合，是保持先進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如常運轉必不可少的辦法。這特別是因為大多數先進資本主義經濟引進了削減工資、削減社會開支的政策。這些政策減低了國內需求，使它們漸增地依靠出口，而且歸根究底說來也使它們漸增地依靠美國的消費所提供的刺激。然而，美國的這個綜合政策也減慢了淘汰仍為恢復獲利能力所必需的多餘工廠、設備和勞工，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也推高了真實的利率。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明顯地不願意承擔這種嚴重蕭條，雖然在過去這種蕭條曾經起了消除多餘生產資料和勞工、提供經濟復甦基礎的作用。但是經濟穩定的代價卻是破記錄的高利率。借債的高昂費用，加上仍在縮小的利潤率，束縛了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直至這年代的末期，經濟的增長還是重重地依仗政府的赤字開支。

由於投資在新工廠、新設備上的回報如此大減，資本在80年代就突然倒向在金融方面大量投資。但是，由於真實經濟產生如此微小的剩餘，從貸款或投機上獲利也不容易，除非得到政府直接或間接的幫助——例如政府付高利率的貸款，或者尋求隨著政府撤銷管制和推行私有化方案而來的貪污腐敗機會。到這個年代末期，商用房地產方面的巨大泡沫就已爆破了。本是80年代金融擴張特色的有勢力收購狂熱，也很不光彩地消散了。負債累累的公司和放債過多的銀行，由於處境不穩，因此大大加深、擴大了1990年到來的經濟衰退。

美國製造業的復甦

對著國際性的緩慢增長和回報率大幅減低的背景，美國的製造業部門以及整個私有經濟，在1986至1995年之間，實現了獲利能力和活力方面一次驚人的復甦。它之所以能夠這樣，是因為它在主要國際對手——德國、日本——那裡學到了如何在國際競爭力和輸出上實現強有力的復甦。但是美國的製造業廠商們並沒有——至少在這個遊戲的後期以前沒有——靠加緊對生產力增長的投資來增加競爭力和獲利能力。它們反而靠以下兩種古典資本主義機制來這樣做：淘汰高成本、低利潤的生產資料和再分配收入使之不利於勞工和海外競爭者。

在80年代上半段及90年代前三分之一段的擴大周期性下降期中，美國的公司擺脫了大量高成本、低利潤的生產方法，特別是勞工方面，因此在投資沒有增長的情況下開始復甦製造業生產力的增長。它們也從以下兩方面得到利益：一方面使實際工資在1985年後的十年中事實上保持不變；另一方面利用列根政府的減稅方案使它們能夠尖銳地減低納稅在利潤中所佔的比率。在同一

時期中，它們也能夠大大地從美元對馬克、日圓的40-60%貶值中得到。各國幣制的這種重新調整是在1955年引爆的，在那時，美國強迫它的主要盟友、競爭對手們同意普拉薩協議，因為這個協議規定將美元從它在80年代上半期所達到的高度上降低下來。最後一點，克林頓政府從1993年上任開始，即試圖平衡政府預算。就這樣，它減低了總需求的增長，因此稍微幫忙降低了通脹和長期利率，而且在對工資施加向下壓力的同時，更加增進了競爭力。

在1985至1995年之間，美國製造業的利潤率大約增加了三分之二。它因此在二十多年來第一次成功地將整個私有經濟的獲利能力提高到超過其1973年的水平。美國製造業獲利能力的起飛，深刻地依靠美國製造業競爭力的異常的復甦，而在上面所指的那十年中，輸出的增加，要比二戰後任何先前的十年期都快。最重要的結果就是，對製造業的長期投資停滯的超越。大約從1994年開始，資本的積累加速了，生產力的增長大踏步地躍進了，因此增強了獲利能力的升高，激起了90年代的擴張。

日本和西歐製造業的困境

在一個各種專門化生產相互補充的理想世界中，美國經濟的恢復活力，也許會推動世界經濟走向新的增長時期。但是，在90年代中期之前，在製造業的生產能力過剩、生產過剩的實際世界中，美國的復甦不但幾乎沒有把增加了的動力傳給世界經濟，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它們的主要競爭者、貿易伙伴、特別是日本、德國的經濟。這是因為直至1993年年底，製造業一直處於國際性生產能力過剩、生產過剩的狀況下。

美國的製造商們在獲利能力上之有所增進，主要是靠美元貶值、實際工資下降和公司稅的減少。他們的投資並沒有增加多少。他們在一個最後幾乎成為零總和（zero-sum即一方得益引致另一方損失）的賭賽中，以減低成本、減低價格以致奪走其對手們的市場份額來提高他們的利潤率。但是他們卻在這個過程中相對少地為其對手們的產品在投資與顧客方面增加需求。當美國政府在1993年採取行動來平衡其收支的時候，美國在世界市場上所造成的需求增長，遭受了額外的、負面的震驚。

作為同一硬幣的另一面，從1993年開始，日本、德國和西歐其他國家的製造業經濟狀況卻受到越來越強化的擠壓。它們的上升的幣值，以及它們的相對快的工資增長，造成了下降的競爭力，因此對已經減少了的製造業利潤和資本積累，增加了向下降的壓力。在此同時，在全球經濟中的投資需求、消費者需求和政府需求的增長率下降，在國內和在國外，特別是在美國，停滯

了對它們產品的購買力。因此，這些經濟既不能夠在80年代下半段避免種種問題的尖銳化，又不能在90年代上半段避免危機的嚴重化。從1991年開始，它們進入了戰後以來最壞的衰退期。到了這個年代的中期，由於日圓升值到戰後以來最高水平的79日圓兌1美元，日本各製造業廠商幾乎不能賺到錢，而日本的經濟開始凍結了。

作為1995-2000年擴張引擎的股票市場泡沫

到1995年春季，日圓的升值已開始威脅著國際經濟的穩定。美國政府，在受到最近墨西哥披索危機及與其有關的特奎拉效應損傷之後，覺得它除了幫忙日本製造業經濟擺脫困境之外別無他法。它所用的方法就與日本、德國政府在1985年幫忙正走向危機的美國製造業經濟擺脫困境的方法一樣——與這兩個國家合作來策劃一次對它自己貨幣的新升值。1995年夏季的所謂反向的普拉薩協議，標誌著世界經濟的一個轉變，因為由此協議而產生的美元升值，以及各種貨幣與它掛鉤，加上日圓、德國馬克與之同時發生的貶值，開啓了一個劃時代的轉移，離開了先前十年所盛行的國際經濟發展的模式。

獲利能力降，普通股價格升

當美元經過十年之久的降值於1995年下半年開始升值的時候，製造業不斷的國際性生產能力過剩、生產過剩的重心，就離開日本和西歐，回到美國了。這個重新調整了價值的貨幣，因此就立刻截短了美國製造業競爭力的長期上升趨勢。美國製造業競爭力的長期上升本來是美國獲利能力復甦的基礎。在1996、97這兩年，美國製造業的擴張勉強可以維持下去，因為生產猛增、生產力加速增長，生產成本有了很大的降低。可是美國製造業卻失去了活力，因為受到了兩方面的擠壓：一方面是因國際性製成品供應過多而起對價格的加緊下壓；另一方面是因貨幣升值致使它自己的相對成本升高。其實，如果美國的製造業各廠商在這兩年中不能夠把實際工資真正降低的話，製造業的獲利能力很可能在那時候就已開始下降了。真實情況也是如此，因為獲利能力不久以後就嚴重地下降了。

與此同時，在1995年，根據三強（G3 powers）所同意的對美元、日圓、德國馬克的匯率作出大轉變的反向普拉薩協議的條款，美國、德國、特別是日本的政府放任大量基金，主要是通過購買各種美國國庫券，湧入美國貨幣市場。東亞的各個政府，以及世界各地的對沖基金投機客，都跟著來。因此，美國長期利率大跌，在這同時，美國聯儲局也推低短期利率（為了幫忙對抗墨西哥披索危機）。

1995年金融市場上巨大的銀根放鬆，以及美元本

身的升值，觸發了股票市場大漲。在這以前——從1980到95年——美國普通股價已大升，但是沒有超過公司利潤的增長。換句話說，直至1995年，股票市場的上升已完全被公司利潤的根本性增加證明為正當。但是，從此以後，普通股價格就遠離了公司利潤，特別是當製造業利潤率停止上升、向下轉的時候。在這時候美國歷史上最大的股票市場泡沫就起爆了。

如果說1995年的國際金融轉向觸發了股票市場的猛漲，格林斯潘和各公司本身就使它長存了。靠近1996年底的時候，格林斯潘就在公開場合擔憂股票價格的「無理性的繁盛」。但是，在私底下，他卻明顯地更關心美國經濟跌交的可能，特別是當美元升值、經濟增長在開頭躊躇不前的時候。格林斯潘沒有企圖去控制外國金錢的湧進、他自己對利率的減低所引起的資產貨幣互換力的大增。事實上，除了1997年初四分之一點的增加以外，格林斯潘在1995年初至99年中之間，沒能提高利率，因此使這個年代下半段的貨幣供應的增加比上半段多了四倍。格林斯潘放鬆貨幣管理制度不但有推動股票市場更加上漲的效果，而且並不偶然的是，它也給「財富效應」火上添油——那就是使各公司、家庭增添賬面財富以致使它們能夠更容易地借到錢，以及就公司而言能夠以膨脹了的價格發行股份，而且以這為基礎，加快它們的投資和消費，以支持經濟的擴張。

美國各公司快速地利用了格林斯潘所賜予的放鬆銀根政策。在1995至2000年之間，它們將借款對GDP的百分比提高到破記錄程度，不但主要地為建造新工廠、購置新設備籌措資金，而且首要地負擔支付買回它們公司自己股份的費用。有了這個方法，它們不但避免了通過在實際上生產可獲利的貨品和服務來創造股份持有人的價值這個冗長過程，而且可以直接推高它們的股份價格，使其股票持有人以及公司行政管理人員得利，因為後者早已被重酬以優先購股權（指在規定日期前按規定的優惠價格認購一定股數股票的權利）。在1995至2000年之間，美國的公司是股票市場上最大的淨購買者。

上升股價的財富效應

恰恰在製造業利潤率所受到的向下壓力將要奪去這個擴張的最初堅實基礎的時候，飛漲的股票市場卻讓美國的擴張在1995至2000年之間繼續和加速。正當公司資產的賬面價值膨脹到超過任何可能的基本經濟價值的時候，它們卻被賦予大量的、除了利潤以外的、另類的、事實上沒有成本的資金泉源。它們可以發行超值的股份；它們也可以在基本上把它们的資產膨脹了的價值當作擔保，來獲得無限止的信貸供應。它們因此能夠不管利潤的相對減少，保持、甚至增加用在新工廠、新設

備上的花費的增長率。感謝這種「財富效應」，擴張才得到了增加的活力。

財富效應的極限

然而，一個由不顧停滯或下降的利潤仍然飛漲的股票價格所推動的經濟擴張，其前途是有限的。利潤的下降趨勢遲早會受到股票市場關注。況且，一旦普通股價格開始下跌，財富效應就會朝相反方向走，而一個面臨越來越大的生產能力過剩的經濟就會猛跌。

1997-98年的國際性危機

在這個關鍵時刻，獲利能力的問題、資產的泡沫化並不局限在美國。在1985至95年之間，東亞各製造業經濟，主要由於它們的貨幣價值降落，實現了不尋常的、以輸出為基礎的增長。這些貶值的貨幣，由於與下跌的美元掛鉤，使這些經濟在與其日本對手們相比的競爭力與市場佔有率上，都有了巨大的進展。這些貶值的貨幣也迫使日本的製造業廠商不但把它們的大部份低檔生產遷移到東亞去，而且也把相當大量的資本貨物和中間貨物朝那個方向輸出。但是，從1995年開始，情況改變了。那個正在削弱美國製造業獲利能力、幫助推使美國普通股價格上升的升值美元，也把東亞各國貨幣往天上拉。因此，東亞各國經濟開始體驗到美國經濟所體驗的雙重趨向：一方面趨向於下降的製造業競爭力以致對製造業獲利能力施加向下的壓力；另一方面趨向於外國資金湧入以致對資產的價格施加向上的壓力。

這個連鎖反應並不到此為止。在1985至95年間，日本各製造業廠商，為了回應升值的日圓，已把生產轉向到東亞，那就是，一方面增加了資本貨物向該地區輸出，另一方面將低檔製造業搬到那裡去。當日圓從1995年在反向普拉薩協議之後下跌的時候，日本各製造廠商能夠從其東亞對手們奪回國內的市場佔有率，迫使後者退出第三市場。但是，因此而來的東亞製造業的危機卻倒過來對日本經濟不利，因為它奪走了日本各公司和各銀行只在最近才成為它們最好的市場。到1998年日本就重回經濟衰退了。

美國的經濟也證明不是無懈可擊的。在東亞的股價、土地和建築業的泡沫爆破、金錢逃離該地區之後，東亞危機在1997-98年猛烈地爆發了，而且很快地被日本之回到負增長所加劇。美國各製造業廠商失去了在東亞和日本的市場佔有率，而且在其國內、國外的市場上也受到低成本的東亞貨物傷害。在1998和99年，美國的輸出，在以空前的步伐上升了這十年的大半時間之後，突然停止增長，而輸入卻以先前的加速了的步伐繼續增加。在這樣的壓力下，美國製造業的利潤率在1997至2000年之間不但下跌了17%，而且應對這段期間非金融

公司利潤率9%的相應降低負全部責任（因為非製造業的非金融公司的利潤率一點也沒有降低）。

與此同時，從1998年中開始，美國各公司的普通股開始大跌，以作為對各公司的利潤在東亞危機、美元升值的雙重壓力下大幅度降低的反應。緊接而來的俄國的拖欠借款和巴西危機，美國在1998年秋初也墜入其戰後時期最嚴重的經濟——金融危機之中。但是，如果美國走向衰退，其他世界經濟的大部份，由於如此依靠美國市場，可能會走向蕭條。

聯儲局支撐泡沫，而泡沫支撐繁榮

1998年9、10月，由於全球各金融市場正在凍結，格林斯潘和聯邦儲備局對LTC對沖基金策劃了出名的緊急援助，而且將利率降低了三次。他們之所以這樣做，首先是要阻止股票市場下跌，抗拒那個威脅著要使國際金融制度失敗的危機。但是，格林斯潘的目標不只是短期的，即阻止普通股市場和金融市場崩潰。他的目標是要向各股票投資者保證，他要使股價上升，以致股票市場繼續上升的「財富效應」可使美國及世界的經濟繼續運轉。

為了幫助我們了解這個情況，我們可將格林斯潘企圖要做的稱之為「股票市場凱恩斯主義」。在傳統的凱恩斯主義政策中，需求不足是靠聯邦政府以花費多於稅收來增加公共赤字「彌補」的。對比起來，在格林斯潘的版本中，需求是靠各公司、各富戶以增加私人赤字來增加的，而他們之以超過自己財力的方法來花費，是被其股票增值所代表的賬面財富增加所鼓勵的。截至1997-8年，美國平衡預算的運動已經把赤字開支減少到零，所以靠傳統凱恩斯方法來增加需求是不太可能了。為了要刺激投資和消費者的需求，因此，為了要抵消製造業的競爭力、輸出和獲利能力的衰退惡化，聯儲局除了迫使股票市場上漲、因此更加增加經濟對財富效應的依賴之外，幾乎別無他法。

多虧他一再向股票市場作出物質上的保證，以及他對「新經濟」的各種贊歌，他達到了他的目標，得到了劃時代的結果。在1998年底到2000年中之間，股票市場飛漲了，而且反過來使美國的經濟繁榮進入最狂熱的時期。不顧同時存在的獲利能力下降，普通股價格達到了歷史上最高水平，各經濟部門的公司——特別是那些享受到不成比例的股市增加的電信、傳媒和科技方面的公司——幾乎可以免費獲得資金。它們在這個基礎上，更加激發了一陣生長量、資本積累和生產力的增加，加速了這個經濟擴張。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因擴張加快而引起美國需求大升，加上仍在升值的美元，不但將世界經濟從1997-98年的危機中挽救出來，而且在1999-2000年激

起了新的國際經濟上升趨勢。美國進口非常快速增長的衝擊，在東亞是最明顯的，在那裡，對高科技零件前所未有的需求，幾乎單獨地把這些新近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及在某些程度上的日本從深度衰退推向快速增長。但是它對西歐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美國對那裡的汽車、機床和其他產品的需求，使德國、意大利經濟的快速復甦成為可能，在這同時，低幣值也使歐元區產品容易進入第三市場。

從股票市場狂跌到經濟衰退

股票市場已經跑到懸崖上面了，但是像童話卡通中的那個人物，只要股票投資者不往下看，只要他們不關心公司的獲利能力，他們還是可以繼續往前跑。在那十年的最後幾年，獲利能力下降曾局部地被生產力大增紓緩了一段時間。生產力大增進是靠各製造業廠商投資增加而得到的。而投資增加是以他們飛漲的股價為基礎而獲得資金所造成的。它（指生產力的下降）也局部地被最富有的20%美國家庭加緊消費所抵銷。佔20%的富戶享受到整整90%因股市飛漲而造成的財富增加。他們也應該對私人儲蓄率在整個90年代史無前例的減少負上責任。然而，在這些年中，儘管生產力加速了、消費增加了，製造業的獲利能力卻大降，生產能力的利用無法提高。這些事實證明，正當這個繁榮達到它的頂點時，過剩生產能力的增加卻佔了極大的比例。

股票市場最後從2000年春開始下降。接著，從2000年晚夏開始，股市就更明確地下降了，因為在那時一連串似乎沒完沒了的黯淡的公司利潤報告戲劇性地挫了普通股價格的傲氣。一大堆從來沒報告賺過錢的電子商業公司，單由於用完了資金，首先關門了。但是，不久以後，這個暴跌就吞噬了電信、傳媒和科技部門幾乎所有的主要公司，包括股票市場曾如此寵愛的裝備製造公司思科（Cisco）、Lucent、北電（Nortel）和零件製造公司JDS Uniphase、Sycamore。在2000年初的總資產價值中，也許有三分之一現在已經煙消雲散了。

由於普通股價格的下降，財富效應已經尖銳地反轉了。隨著各公司、家庭的賬面資產大減，它們不但覺得更難借到錢，而且覺得這樣做的興趣比較少，特別是自從日增的破產和失業威脅致使它們留意自己的負擔過重的資產負債表以來。它們反而自然而然地削減在資本貨品和消費品上的支出。但是，隨著投資增長率降低，生產力增長率也不得不降低，這就更加對獲利能力施加向下降的壓力。

尤其是，經濟中突然有了一大堆根本無法獲取利潤的工廠、設備和軟件，特別是當消費的增長率突然變差的時候。由此而來的生產能力過剩已經在2001年成功地將製造業（除利息後）的絕對利潤從其1997年的高峰減

低了60%，同時將非金融公司部門的利潤率從其1997年高點減低了25%。

在反向財富效應的衝擊下，面對著巨大的過剩的生產能力，產量和投資增長率的下降，比二戰以來任何可比較的時期都要快，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從1999年中-2000年中這一年的5.2%下降到2001年上半年（以一年計算）的0.8%，而在同一時期非住宅的投資增長率則從11%下降到負7.4%。就是這個投資在製造業生產能力過剩、獲利能力驟降的衝擊下暴跌，才是經濟衰退的主因。

緊隨著股票市場猛跌和獲利能力減少，製造業的僱用情況和產量立刻開始劇降，致使製造業的總工作時數從1997年的高峰到2002年第一季令人吃驚地下降了12%。但是，美國經濟作為一個整體，只大約從2001年中才開始隨著增長率和資本積累降落而充分顯出深度的收縮，才開始採取標準的自保措施。從那時以來，美國各非製造業公司已經一直在裁減大部份的生產能力，特別是勞動力，為了要恢復競爭力和資產負債的平衡，迫使它們的競爭對手們也作出同樣的反應。這一切合起來的效果就是觸發了一個強有力的螺旋式下轉。在下轉中，下降的投資和消費引致了解僱、破產和拖欠債款的上升，造成了需求的更加劇降，創造了使衰退深化的壓力。

在美國進入衰退的時候，世界其他部份也跟著進入衰退。股票市場在此以前最後一次上漲曾經執行了必不可少的任務，不但把美國，而且把世界經濟從1997-98年起源於東亞的國際經濟危機中挽救出來。但是，隨著美國普通股價格和投資的崩潰，特別是在高科技方面，這個影片開始倒過來放了。在美國進口驟然下降的衝擊下，東亞、日本以及也許是西歐的經濟衰退速度比美國更要快。當這些經濟走下坡時，美國出口增長率的下降變得更快。這個結果就是互相增強的國際衰退趨勢。

擴張政策能夠堵住這個大潮嗎？

為了要阻止經濟在2001年令人驚恐的猛跌，聯邦儲備局極端尖銳地、快速地降低了利率。這個想法當然是要使借債的實際成本特別低廉，以鼓勵消費。

可是，從開頭就應該非常明顯的是，這個政策對資本積累使經濟復甦這個終極關鍵，卻沒有直接的作用。各公司已經擁有太多的工廠和設備，所以根本不想增加投資。所以，不管利率多低，它們都不會去借債的。就這個意義而言，用一句凱恩斯的名言，聯儲局「正在一條線上推」（意思是：徒勞無功的）。

然而，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減息，就其主要短期目標——即刺激消費者的消費——而言，倒是相當成功的。極端便宜的信貸卻使家庭借債大增，特別是為房屋

抵押借款再籌資金方面，即使在失業率逐步上升的時候。個人消費的增加，至少在目前，單槍匹馬地挽救了經濟。在2001年全年和2002年第一季，家庭借債的增長率比那個由債務所推動的1990年代任何時候都要快。這就使個人消費在2001年增加了3.1，在2002年第一季大增了6%。為了回應消費者消費的這種增加，各公司開始再度積累在經濟下降趨勢加深時減少的貨品存量，所以GDP已有所增加。就是從家庭借債的增長、到消費者消費的增長、到存貨的增長的這個因果關係，才是2001年第四季、2002年第一季的GDP增長率大幅度上升的主因。

但是，正因為這次復甦幾乎一直單獨地依靠消費者消費及其背後的消費者欠款的快速增長，它的基礎才是非常搖晃不定的。非居住用投資增長這個使經濟健康的關鍵，已經像石頭一樣往下掉——從2000年上半年的平均年增長14%，到2000年下半年的4%，到2001年的負3.2%。出口增長率也崩潰了——從2000年上半年的11%，到2000年下半年的3.3%，到2001年的負4.5%（雖然它在2002年第一季開始回升一點點）。

投資和出口兩者的下降趨勢，是支配了這個經濟直到2001年底螺旋下轉的主因。政策制定人的目的，當然是使消費者的消費繼續推動經濟到投資和出口都能復甦。他們希望，在繼續上升的消費者購買力刺激下，投資能夠復甦。但是他們所擔心的是，那個曾對利潤下降負責的工廠和設備過剩，會繼續阻止投資的新爆發：其實，在2002年第一季，非居住用的投資又跌了（以一年計算的）6.8%。至於出口，雖然我們可以預料它可能隨著美國經濟好轉刺激世界經濟其他部份增長而上升，但是幾乎確定的是，由於美國經濟傾向於消費，出口總是落在進口之後的。

利率的減低到底能夠使消費者繼續消費多久，這本身就是一個關鍵性問題。在2001年，家庭借債的增長率之作為GDP的百分率達到1980年以來的最高點（除1985年外），而家庭欠款之作為GDP的百分率達到有史以來最高水平，幾乎比1990年的水平高出25%。因此，似乎十分可能的是，特別在失業仍在惡化的情況下，許多家庭不久不得不要減少借新債，因而減少消費。家庭消費在2002年第一季的增加只有2001年第四季的一半，這也許顯示這樣一種減慢已經開始。如果真的是如此，這個剛開始存在的上升趨勢就可能會夭折。

對著這個深刻不穩定的背景，90年代晚期的泡沫所遺留的各種巨大的「不平衡」，就像烏雲一樣陰森地逼近。

（1）家庭借債、特別是公司借債破記錄的增加，是這次繁榮的主要原因。但是由於經濟前景越來越差、破產越來越多，各公司已經以大量削減借債來減少受到

損害的機會。如果這個情況繼續大規模發生的話，對投資作多大的鼓勵都是沒有用的。

(2) 在2001年，美國貿易及往來帳戶逆差已經是連續第三年達到空前的高點。不久以前，海外投資者還非常願意以直接在美國作出巨大投資和大量購買美國公司股票和債券，來向以上所說的逆差提供資金。但是由於美國的經濟衰退繼續令人對其前景失望、股票市場繼續萎靡不振，世界其他部份似乎終於發現美國資產的吸引力比以前小了。在2001年，雖然外國人購買債券的情況增加了，外國人直接投資在購買或成立美國公司的情况大減了60.4%，而世界其他部份購買美國股票的情況則減少了35%以上，在2002年第一季又減少了（以一年計算的）45%。

由於這種對美國資產不抱幻想的結果，對貨幣的壓力就加劇了。在本文正在寫的時候（2002年6月中），美元跌了很多，特別是對歐元而言。如果這些趨向繼續的話，聯儲局可能不久就面對一個極度痛苦的選擇：要麼讓美元下跌而且冒著被外國投資者如此大規模變賣美國資產的危險，以致不但會嚴重破壞了資產市場，而且會觸發真正對美元的拋售；要麼提高利率，甘冒將經濟推回衰退的危險。

(3) 普通股價格明顯地降落了很多，作為對商業前景惡化的反應。但似非而是的是，普通股價格的跌落卻沒有使股票價值與利潤一致，因為在許多情況中利潤也跌得一樣多。在2001年底，標準普爾500指數已經跌了三分之一以上，但是這個指數所代表的各公司的價格收益比率卻不比它在2000年中的高峰時的數值低。對納斯達克指數而言，情況也是一樣。由此可見股票的價格還是過高，因此股票行情看來還有一大路程可跌。

使情況變得更壞的是，一連串令人目瞪口呆的帳目醜聞毀壞了這個國家愈來愈多的重要公司。這些帳目醜聞的特徵是：高級經理人員有系統地隱瞞了公司的開支、過份誇大了公司的利潤，以及侵吞了公司的資產作為己有。許多受到肆虐的公司不久之前還是股票市場頂尖的高科技明星，其中不但有安龍（Enron），而且包括巨型電信公司Global Crossing、Quest和世界電訊（World.com），更不必提Merck製藥公司和Adelphia Cable了。這些騙局絕對不是意外的，而是一個在利潤方面缺乏真實基礎的泡沫經濟不可避免的副產品。

就是因為在90年代最後幾年中股票市場的飛漲是保持經濟在面對下降的利潤率時繼續轉動的主要力量，聯邦政府官員們始終有興趣將他們的目光移開公司的會計實施。同樣地，自從公司行政人員被迫使「股東價值」增加到最大限度以來——特別是因為他們的大部份薪金往往是以優先認股權的形式付與的——他們就受到極大壓力去盡可能長久地隱瞞陰暗的現實和下降的利潤

率。但是，他們當然不能永遠這樣做，因此對這些事實的無可避免的揭露，就毀壞了投資者的信心。他們是有充分理由這樣想的。

根據〔精明股票投資者〕網站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列在納斯達克指數中的一百個公司，在2001年頭三季，向股票持有人和傳媒宣佈了總共190億美元的利潤。它們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依據所謂「預計的」標準，因為它們為了這個目的可以合法使用這個標準。然而這一百個公司卻無法避免在同一時期向證券交易委員會報告了823億美元的虧損。這是因為在呈交給證交會的利潤虧損報告上，法律規定它們要使用嚴格的被普遍接受的會計原則。假如股票行情繼續下降的話，隨著經濟復甦如此易碎，對企業信心及對一般的經濟影響，很可能令人非常沮喪，開啓了美元和資產價格兩者互相增強的向下螺旋的可能性。

陰暗的前景

歸根究底來說，利潤率這個任何復甦的最終關鍵，仍然是低下的，在1990年代推它向上的各種力量都離去了。在2001年，製造業公司的利潤跌到了1986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在這同時，非金融公司的利潤率跌到了1981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可是，美元仍然是相對地高，使美國製造廠商的國際競爭力無法升高，因此使製造業利潤率的任何復甦特別困難。還有，股票市場的（反向）財富效應既不再能夠使需求膨脹，又不再能夠使投資幾乎不需要成本。

即使經濟的增長率在2002年第一季加速到幾乎6%，聯邦儲備局到現在為止還是無法提高利率。這就顯示它仍然不相信經濟正在起飛、復甦是有把握的。同樣地，股票市場繼續躊躇不前，在911之後又跌回2001年秋天的低下水平。明顯的是，大企業嚴重地懷疑這個由消費者帶頭的上升趨勢。格林斯潘已宣佈這個衰退已過去了。但是這個經濟還是沒有脫離險境。

〔註〕布勒納（Robert Brenner）是《逆流前進》雙月刊的編輯之一。這篇文章部份基於他的新書《這個繁榮與這個泡沫：在世界經濟中的美國》（The Boom and The Bubble: The US in the World Economy），Verso出版社於2002年4月出版。

2002年6月

〔譯自《國際觀點》2002年7/8月合刊，總第342期〕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

(八)

曼德爾著 兆立譯

第六章

托洛茨基與第三世界的解放運動

(一)

托洛茨基確信，1905年的俄國革命，對於其他的、甚至比俄國更落後的國家，都會有影響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在波斯、中國和土耳其所爆發的革命，證實了他的這個觀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破壞力和俄國革命的影響力，其重大的程度，遠遠超過1905年的影響力，因此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在國際勞工運動中有了一個嶄新的意義。從那以後，它就是國際革命的一個基本組成部份了。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而言，這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所通過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提綱”^{<1>}中，以綱領方式表達出來。社會民主黨也對世界政治的這個新現象作出有限度的反應。1926年局部由社會民主黨人所組織的布魯塞爾會議，有好幾位民族解放運動的著名代表參加（其中有尼赫魯），這些人，日後都變成國家的創立人和有名氣的世界政治家。

在許多這些國家中，特別是在印度、中國、幾個拉丁美洲國家中，第一次世界大戰刺激了一個工業化的過程。^{<2>}這就引起了與古典的、作為外國資本直接代理人的買辦資產階級十分不同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出現。民族資產階級也與外國資本有關係，但是它有較大程度的財政獨立性，而且有十分不同的眼前利益。

與外國資本一樣，買辦資產階級和依賴出口的地主，都為自由貿易的政策辯護。可是，由於便宜進口貨競爭的影響，這個政策威脅著破壞工業化的任何可能性。因此，民族資產階級支持一個保護性的、限制外國貨的關稅政策，以使他們自己的工業產品能夠在自己的國家之內有一定的市場。這些不同的經濟利益

導致不同的政治觀念和策略。政治自決的口號和較晚一點提出的國家獨立的口號，都是需要尋找合適方法來保衛這些特定利益的一個表達方式。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也出現一個近代的無產階級，這個階級比民族資產階級強大些，因為它都替外國資本和本國資本工作。從開始，對這個無產階級的階級運動的恐懼，就意味著民族資產階級在參加爭取國家獨立的群眾運動時，骨子裡是不情願、不確定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使國際勞工運動面臨以下的主要問題：對帝國主義和這些民族運動之間的日益尖銳的衝突（包括武裝衝突），它應該採取什麼政治立場？在這個問題上，準備在資產階級民主、但是帝國主義的國家骨架之內接受政府責任（或者參加聯合政府或支持政府）的那些政黨，與反對這種社會伙伴形式的那些政黨之間，必然起了衝突。

第一個在帝國主義國家的骨架之內因負有政府責任不得不採取步驟來維持殖民地的政黨，是英國工黨。托洛茨基在1924年就已經指出，麥克唐納的第一任工黨政府，依循英國帝國主義國家的邏輯，參加了殖民地的鎮壓。他在他的1926年在英國出版的《英國往那處走？》一書中寫道：

他們首先以一個負責的反對黨的身份，然後以一個政府的身分，必須對國家的存在這個最嚴重問題，回答“是”或“否”……換句話說，它要麼必須從它反對帝國主義國家的經驗中得出革命的結論，要麼必須公開地替這個帝國主義國家服務。不用說，所發生的是後一選擇。和平主義的麥克唐納開始建造巡洋艦，開始把印度人、埃及人關進監獄……。^{<3>}

但是，特別是與印度的、由甘地和尼赫魯的國民大會黨所領導的、急速發展的、爭取自治的運動起衝突的，是麥克唐納的第二任工黨政府。它在1931年企圖用圓桌會議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沒有成功。

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作出了向人民陣線轉變的政策之後，斯大林主義化的各國共產黨面臨同樣的進退兩難。〈4〉法國共產黨在斯大林一賴伐爾條約簽訂之後投票贊成戰爭信用貸款。在西班牙，西班牙共產黨所支持的人民陣線政府之拒絕讓西屬摩洛哥立即獨立，是內戰悲劇結束的重要原因之一。〈5〉

托洛茨基在保衛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綱領和連續性的鬥爭中，總是認為無條件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國主義國家的解放鬥爭，是一個原則問題。對他來說，這絕對是一個基本的問題：

有色人種反對帝國主義壓迫者的運動，是最重要、最強大的反現行秩序的運動之一，因此要求白種無產階級的完全、無條件、無限制的支持。……對一個共產主義者而言，殖民地國家反對帝國主義國家的戰爭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戰爭。

〈6〉

不管與帝國主義交戰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或者那個國家的政府的階級性質是什麼，托洛茨基總是抱著這個立場。海爾·塞拉西皇帝的國家是一個專制、封建的國家。但是，托洛茨基的觀點是，它在1935年墨索里尼的侵略之後轉變為意大利帝國主義的一個殖民地，就是一個倒退的步驟，不管意大利國家的法西斯性質。他不單對軍事衝突，對經濟衝突也採取同樣的立場，例如，對墨西哥國有化外國石油公司的問題。

這個政策是根據帝國主義在二十世紀的歷史倒退性而得出的，這些事情，我們在第一章中已經討論過。托洛茨基在三十年代亞洲的以下兩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衝突中，再為這個立場辯護：中日戰爭和英國與印度之間的爆炸性的衝突。

這兩個情況都不容易堅持這些基本原則。就中國而言，抗日戰爭的領導是反動的蔣介石政權。蔣介石是屠殺數十萬計的工農的劊子手。但是儘管如此，托洛茨基最明顯的是，中國之轉變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就只會替這個巨大國家帶來了不幸和歷史性的倒退。日本的失敗，無論如何，會有較小的害處。

托洛茨基也以同樣的態度，看待英國與印度之間的衝突。儘管英國工黨和英、印兩國的共產黨為了所謂世界一政治的“優先考慮”，將印度獨立的問題延遲到德國、日本失敗之後，這個延遲卻是個令人厭惡的政策。〈7〉它使數以百萬計的印度人民的生命有了可怕的結果（例如，1942年英國帝國主義在孟加拉

所引起的飢荒，造成數以百萬計人民死亡）。這個政策事實上便利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治和軍事的行動。它也在印度推遲了獨立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群眾運動的發展。它使印度資產階級在尼赫魯領導下能夠對印度群眾保持了幾十年的政治統治。印度共產黨由於向英國帝國主義投降，不但沒有加強反希特勒的聯合力量，反而加強了英國、日本帝國主義和印度資產階級的力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的時期，因英國、法國和荷蘭的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未能實踐這些原則而釀成的可怕後果，達到了災難性的程度。上述這些政黨所參加的政府在阿爾及利亞、印度尼西亞、印度支那、馬達加斯加、馬來西亞和肯尼亞從事戰爭和大規模鎮壓，使千千萬萬人喪失生命。托洛茨基認為，帝國主義每一種侵犯民族解放運動的形式、帝國主義向第三世界國家發動的每一次戰爭，都是反動的。他的這個原則性立場，到今天還是適宜。

（二）

托洛茨基在1906年所得出的不斷革命的理論和戰略應用到較發達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前，猶豫了一段長時間。他的猶豫，並不是單單為了要防止斯大林和布哈林以此為藉口，將黨內鬥爭轉變為“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他的一些最親近的同志，卡爾·拉狄克、普里奧布拉仁斯基、斯米爾加以及稍後在聯合反對派中與他同盟的齊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也都反對他的理論。他的猶豫也是他對一些最重要的第三世界國家群眾運動的覺悟程度和社會性質估計的結果，特別是對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和以後的墨西哥。

托洛茨基的政治朋友之一，荷蘭共產黨員亨德里克·斯尼夫利也特（Hendrik Sneevliet，化名為馬林），曾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參與印度尼西亞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他在印度度過許多年，擔任工會的一位領導人。〈8〉當他在印尼時，他發覺薩雷克特伊斯蘭這個伊斯蘭教的運動，對印尼群眾有很大的影響力。於是，他建議新成立的印尼共產黨作為一個派別在薩雷克特伊斯蘭的內部活動（是否以一個公開或秘密的派別，我們所知的文件沒有說明）。他對印尼的這個群眾運動的估計是，它是一個絕大多數非無產階級的運動，其中的無產階級成份非常微弱。所

以，不斷革命的理論和戰略的一個中心的先決條件還沒有成熟。〈9〉

托洛茨基既不反對，也不接受這個論點。他的態度是等待歷史的發展來解決這個問題。雖然他對斯尼夫利也特的這個策略有極大的保留，但是，當斯尼夫利也特提議、共產國際接受中國共產黨應該加入國民黨的時候，他起初並沒有反對將這個策略擴張到中國去。

1905年的俄國與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還有一個重要的差別。不斷革命論說，在俄國，只有通過工人與貧農的聯盟推翻國家政權，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的全部歷史目標才能實現。這個理論，按照這個一般形式應用到第三世界中最重要的一些國家的時候，沒有回答這個問題：是否民族—民主革命的每一個歷史目標的實現都需要同樣的先決條件。這樣的一個目標是爭取國家獨立。

要資產階級或者城市小資產階級堅持進行爭取國家獨立的鬥爭，是一回事；要他們堅持地為急進土地改革而戰鬥，換句話說，要他們為了農村財產關係的真正革命而戰鬥，則是十分不同的事。這樣的土地革命，不但會與資產階級的政治、社會利益衝突，而且會越來越大地與它的眼前經濟利益相衝突。可是，國家的獨立就會完全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政治利益相符合。因此，不能被排除在外的是，這個民族資產階級會為國家獨立而戰鬥，而且會贏取國家獨立。關於這個問題，也需要等待實際的發展。

1926-27年的中國革命帶來了這個真正的考驗。中國這次革命所證明的，是所有那些拒絕把不斷革命的理論和戰略擴展到重要的第三世界國家去的共產黨人的政治立場基本弱點。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是準備為國家獨立而戰鬥。它甚至準備動員群眾來達到這個目的，當然只要它能夠控制這個運動。但是，這就意味著要把自發的土地革命和自發的工人鬥爭與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分離。長遠來說，資產階級既不能控制，又不能容忍這些鬥爭。農民一旦進入了群眾行動的階段，相信他們會準備忽視他們自己的社會—經濟利益，那是不切實際的。城市工人一旦被革命的進展所喚醒而進行群眾鬥爭，相信他們不會為他們自己利益而戰鬥，同樣是不切實際的。中國革命這次完全證實了這些。

隨著工人、農民的獨立群眾行動力量日益壯大，蔣介石所領頭的資產階級要以大規模鎮壓工農來把這

個革命轉變為反革命的誘惑力也日益增大。托洛茨基和聯合反對派連續幾次向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警告這個危險。〈11〉但是，斯大林—布哈林派越想要把這個革命縮減為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國家獨立的鬥爭，他們就越傾向於對資產階級的要求讓步，把與工農解放有關的各個決定性問題與民族鬥爭分離。

蔣介石以清除與帝國主義勾結的軍閥為目的的北伐，特別是他的到達上海的北伐軍，被完全與這個革命等同起來。〈12〉一切事情現在都要臣服於這個在物質上受蘇聯支持的北伐的成功。接著，就發生了蔣介石的1927年4月11日政變和屠殺數以萬計的共產黨員和工人。在這個大災難的前夕，斯大林還贊揚他為一位偉大的朋友和英雄。

中國共產黨內以陳獨秀為首的領導層，本來是為紀律的理由不情願地服從這條路線的，現在卻被說成是應替這個徹底失敗負責的替罪羊。中國共產黨人和共產國際對下一步應該推行的正確戰略或策略，現在是完全混亂不清了。〈13〉到最後，團聚在毛澤東周圍的這一群人開始應用它自己的策略。斯大林主義官僚層起初對毛的政策不高興。他們容忍了一陣子，後來，終於強烈地反對了。〈14〉

從1926年開始，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革命民族主義者，就像1905年的俄國社會主義者那樣，面對著這樣的選擇：革命分兩個階段進行還是不斷革命。這是托洛茨基從中國革命中得出的主要教訓。他的結論是有系統地表達在他1928年所寫的《不斷革命論》一書中。他寫這本書，不但是為了反駁他的政敵攻擊，而且是為了清除他的一些合作者的疑惑，例如拉狄克。自從那時以來，歷史已經證明，這是托洛茨基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論和實際的鬥爭之一。〈15〉

摒棄階段論，並不表示降低在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國家獨立和土地革命鬥爭的價值。托洛茨基在1930年論及印度支那的革命時，寫道：

不推翻這個殖民奴役的政權，是不可能沒收大、中型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的。這兩個問題，民族問題和土地問題，必須盡可能在工人和農民的意識中緊密地連繫在一起。……國家獨立……是印度支那革命的一個必要元素。……人民大眾的民族主義，是他們對他們的壓迫者，即外國帝國主義者，表示正義的、有進步意義的仇恨所採取的基本形式。無產階級沒有權利輕視這種民族主

義。恰好相反，它必須在實踐中證明，它是爭取印度支那的民族解放的最堅持、最忠誠的戰士。

<16>

約五年後，他對南非民族解放鬥爭的重要性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隨著英國帝國主義在南非自治領土的停留，沒有一種社會變動（第一個例子是土地革命）是可想像的。推翻英國帝國主義在南非的統治，不但對社會主義在南非的勝利是必不可少的，對社會主義在英國本身的勝利也是必不可少的。

<17>

托洛茨基在Harald Isaacs（伊羅生）的《中國革命悲劇》一書的導言中寫道“爭取社會關係的民主化和爭取建立民族國家的鬥爭無縫地發展為反對外國統治的公開暴動”。<18>他在左派反對派中最有才智的批評者，普里奧布拉仁斯基，責備托洛茨基專注革命進程中的領導問題，而把特定任務的問題看成為次要。上面的引句證明，這並非如此。托洛茨基是根據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規律而對第三世界國家中的革命進程問題作出辯證的分析，像他在俄國革命中所作的一樣。他分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中的具體社會關係，以及從這些而來的歷史任務。從這個分析，他就對不同社會、政治力量在革命和反革命中將會採取的具體立場，作出結論。托洛茨基不但沒有低估土地革命和國家獨立的任務，反而得出結論，指這些任務，只有在與貧農聯盟的工人階級領導下，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完全實現。

這個分析，是根據對農村中的生產與財產關係的實際結合的一種具體、但決不是先驗圖式的了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較發達第三世界國家中，這不能被縮減為“要麼封建主義，要麼資本主義”這個過份簡單化的公式。以下是托洛茨基如何在1929年總結他的立場：

大中地主（按中國規模）與城市資本（外國資本也在內）是有最密切關係的。中國沒有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封建地主階級。農村中的一般的最廣泛而且極殘酷的剝削者就是富農和高利貸者，即城市銀行資本底經紀人；所以中國底土地革命具有反封建的同時亦是反資產階級的性質。……土地革命在起初發展時將不僅是反對幾個真正封建地主或官僚之暴動而已，更要反對富農與高利貸者。假如貧農委員會在俄國僅在十月革命之第

二時期即一九一八年之中發生，在中國則土地革命只要一復活，貧農委員會就要採取各種方式而出現。反對富農將是中國十月革命之初步，而不是它的第二步了。<19>

歷史已經完全證實托洛茨基的預測。<20>不斷革命論之向較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擴展，就成為國際左派反對派的第一個綱領一部份了。<21>

（三）

不斷革命的戰略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應用，首先意味著對工人和農民的獨立組織的支持和保護，不顧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所設置的要求和條件。<22>這就以工人（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的政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為先決條件。

就二十年代的中國而言，斯大林和布哈林卻為相反的觀點而辯護。他們認為，國民黨不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而是農民、工人、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四階級聯盟”。歷史已給這個非馬克思主義定義以致命打擊。托洛茨基和聯合反對派反對這個立場的種種論據，都已經保持它們的有效性。<23>

拉狄克在1927年3月18日的一篇對共產主義學院的演說中，就斯大林和布哈林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看法，批評了他們的中國政策。他宣佈，蔣介石在非常短時間內就會轉過來對付中國共產黨人，並且會出賣這個革命。斯大林在1927年4月6日的一篇對莫斯科黨的演說中譏笑了拉狄克的立場。斯大林說：“蔣介石也許不怎麼同情革命，但是他控制軍隊，所以沒有其他選擇，只好領導這個軍隊反對帝國主義者”。<24>只有幾天之後，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的軍隊開始屠殺上海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人。

陳獨秀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本來是不情願地接受共產國際要他們附屬國民黨的指令。隨著事件的開展，他們越來越懷疑這個政策。根據王凡西的回憶，我們可以說，托洛茨基和陳獨秀，幾乎同時但又彼此獨立地，決定把不斷革命的理論和戰略擴展到中國去。這導致陳獨秀後來參加了國際反對派。在這同時，而且又與陳獨秀獨立地，一大批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參加了反對派的隊伍。這個行動使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喪失了性命。<25>

在較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解放運動中著重工人階級的政治獨立性，當然並不對聯盟問題提供答案。<26>反對殖民主義列強的反帝聯合陣線是與工人階級的獨立不相容嗎？托洛茨基與他之前的列寧一樣，

傾向於否認任何如此的不相容性。他對反帝聯合陣線所用的規則，是與過去曾被用在無產階級聯合陣線中的規則一樣：分頭進軍，共同攻打。

分頭進軍不但意味著在保衛工人、貧農的利益時全力保衛工人政黨的行動自由，並且拒絕把這些利益臣屬於聯盟的要求。它也意味著設法確保人民大眾能意識到：（1）這個聯盟依靠資產階級同盟者真正要與帝國主義者戰鬥的意願；（2）這只會局部地是如此，而且只會維持短時期；（3）群眾一定要準備有一天民族資產階級會與這個聯盟決裂並加入反革命陣營。

另一方面，共同攻打則意味著工人的政黨決不是口頭說說，而是要以群眾性的鼓動、動員和行動，真正地為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標而戰鬥。它也意味著這些政黨要向它們自己的黨員和群眾說得清清楚楚，國家獨立這個目標是符合勞動人民利益的。這裡與工人階級的聯合陣線非常相似，例如在反法西斯的鬥爭中。在這個意義上，反帝聯合陣線，只是工人階級奪取民族解放運動領導權的一般戰略中的策略變體而已。

在上海、廣州的工人們遭到失敗以後，托洛茨基在好幾個場合中表達了他對下一次中國革命能在游擊戰的基礎上成功的懷疑。我們在這裡不得不要區別這個農民戰爭的兩個階段。從1930年到1937年的這個時期的主要特點，是防禦性的，以“長征”到延安為象徵。在這個階段，中國都沒有革命浪潮。

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掠奪戰爭在1937年爆發，這個局勢起了根本變化。現在，反對侵略的群眾動員變得可能。而且，雖然在開始，這個戰爭是由蔣介石領導的，但是，一個獨立的、武裝的、反對戰爭的群眾運動卻能夠發展起來，這個群眾運動與國民黨爭奪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權。就客觀的因素而言，第三次中國革命的成功發展，再度提上了議事日程。民族解放鬥爭發展為一次社會革命。

托洛茨基早已看出這個可能性。以下的引文足以證明這點：

中國無產階級的當前任務，是以動員、武裝廣大的勞動人民群眾來進行抗日戰爭，以致日本的失敗和革命的爆發將會伴隨著中國無產階級反對國民黨賣國賊和帝國主義走狗的勝利……。
<28>一個手中拿著武器的人民，今天知道怎樣對付一個強盜，明天將會知道怎樣對付其他的強

盜。一個革命政黨，如果了解這點，而且自覺、自願地領導一個人民來保護它的獨立——只有這樣一個政黨，才能夠在戰爭中和戰爭之後，動員起來，將政權從民族資產階級手中奪走。<29>

這裡，我們在應用不斷革命的理論和戰略到第三世界時（在目前這個情況中應用到中國時），達到了另一個關鍵點：由民族解放、土地革命所建立起來的政權的性質。就托洛茨基而言，不斷革命的理論和戰略之擴展到中國和較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去，不但意味著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等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爭奪政治領導權的鬥爭，而且意味著奪取國家政權、推翻現有國家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這就需要對民族資產階級所建立的國家的階級性質、和能夠及應該代替它的國家的階級性質作一個判斷了。

對這個中心問題，斯大林、布哈林和以後在兩個人民陣線時期（1935-39年和1941-47年）中的斯大林派共產黨，都為一個基本上是右傾——孟什維克的立場辯護。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在半殖民地國家的議事日程上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標可以在與資產階級的合作中及在資產階級國家的骨架內實現。

毛澤東在文字上為一個中間立場辯護。他不否認國民黨能夠領導民族解放鬥爭、甚至土地革命到勝利。但是，他在他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書中卻為這樣的論點辯護，那就是，建立有雙重性的，一半資產階級民主、一半無產階級民主的國家和軍隊是可能的。毛派人士起初聲稱，他在1949年10月1日所宣告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這樣一個國家。他們以後修改了這個立場，承認由毛澤東宣告成立的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30>他們因此含蓄地承認，在從1926年延續到1940年（1949年）有關於使中國革命能夠勝利的條件這個重大、有歷史意義的爭論中，托洛茨基一直是對的。

中國共產黨的實踐與它的理論完全不同。雖然毛澤東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甚至在紙面上接受軍隊向蔣介石的臣服，但是，他在實踐上保持人民解放軍的獨立，使它不但在反對日本、而且在反對蔣介石的戰鬥中壯大、堅強，因此為1946年以後散遍於華北、華中的農民暴動創立了政治——組織的先決條件。<31>毛澤東消滅了資產階級軍隊和資產階級國家，代之以不同階級性質的軍隊和國家。

這是不是說，“新民主主義”這個錯誤理論的歷史意義不重要呢？遺憾的是，不是不重要呀！因

爲，資本主義世界最強大的共產黨，在艾迪（Aidit）這個不幸人物領導下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就不照毛的實踐去做，而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照他的理論去做。不幸的是，印尼軍隊並沒有“雙重性”。它是印尼資產階級的一個反革命工具。它在1965年消滅了印尼共產黨，殺害了將近一百萬共產黨員、工會分子、農民和青年。它是自從希特勒走上政權以來國際工人階級運動所遭受的最壞的災禍。
<32>

中國托派也犯了區分不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中國共產黨的實踐之間的錯誤。他們看到，從1937年到1946年所用的公式，正是1925-27年時期用過的公式。他們沒有看到，這兩個時期的實踐，有基本的不同：在早先時期，共產黨真正是在國民黨的指揮之下；而現在，一支獨立於國民黨的人民解放軍正被創立起來，而且，至少在農村中，一種不向資產階級臣服的實踐正在推行中。<33>由於托洛茨基在當時收到不確切的資料，所以，當他在1940年5月寫“帝國主義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這個宣言時，對中國共產黨的觀念和前景，作出了錯誤的結論。<34>

托洛茨基也憂慮，當農民軍隊佔領工業城市時，它也許會反過來對付工人，鞏固資本主義。在1949年以後的一段短時期內，這個憂慮似乎會成爲事實。可是，不久以後，情況就明朗了：人民解放軍和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並不是鞏固資本主義統治，反而是消除資本主義統治的工具。它的階級性質，不是被大多數兵士的社會根源所決定（紅軍的大多數兵士也是農民），而是被中、高級幹部的社會根源和政治信念所決定，換句話說，是被中國共產黨的機構的社會根源和政治信念所決定。而這個機構既不是農民的，又不是資本主義的。

然而，由於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我們必須承認，托洛茨基對中國共產黨的錯誤估計中也有其真知灼見。第三次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一個甚至在奪取政權之前已經完全官僚化的、深受代替主義這個幻想之害的政黨的勝利。它之拒絕以中國無產階級自由的自我組織爲基礎，換句話說，它之拒絕以工人的委員會爲基礎，特別是在佔領城市之後，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從開始就被一個硬化的黨、政、軍官僚層的所控制。毛澤東在五十年代末期部份地認識到這點。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企圖部份地以嚴厲的鎮壓措施來與這個官僚層鬥爭，但是，在他臨死之前，被迫承認，他的企圖

是個失敗。鄧小平企圖以經濟自由化來打破這個官僚層的權力，但是，他的企圖也失敗了，而且以天安門廣場的鎮壓告終。

托洛茨基的政策沒有在中國被採用。爲了推翻蔣介石政府，農民軍隊不是與獨立的無產階級和以委員會爲基礎的權力連在一起，而是與一個胸懷狹小、握有無上權力和專斷的官僚層連在一起。中國共產黨人、中國工人和中國人民爲這些失敗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註釋

- <1> 見《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第一卷，1977年倫敦版，第109-183頁中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會議記錄和議決案。
- <2> 托洛茨基在他的1915年出版的小冊子《戰爭與國際》中，預見了這一點。這個小冊子的摘錄，收集在John Riddell所編、1984年紐約版的《列寧爲一個革命國際的鬥爭，1907-1916年的文件》，第150-156頁。
- <3> 《英國往那裡走？》，1926年倫敦版，第161頁。也見他的“對東方勞動人民的莫斯科共產主義大學學生的演講”（1924年）。該演講詞收集在喬治·諾伐克所編、1964年紐約版的《不斷革命的年代，一部托洛茨基選集》，第236-237頁。
- <4> 見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決議案。這些決議案收集在Jane Degras所編的《共產國際1914-1923年。文件》，第三卷（1965年出版），從第364頁開始。
- <5> “佛朗哥的主要活動基地是摩洛哥，一個只有被西班牙通過多年野蠻的沙漠戰才征服的殖民地。甚至從資產階級民主的觀點來看，這個共和國都可以宣佈這個被壓迫的殖民地人民的獨立。從戰略上來說，爲了爭取摩洛哥人民爲反法西斯戰鬥的盟友，極應該這樣做。但是斯大林和〔擔任西班牙總統的〕阿薩尼亞卻怕英、法政府驚恐，因爲後者在非洲持有廣大的殖民地。因此這個共和國保衛了西班牙帝國主義統治摩洛哥的權利”（托洛茨基：《西班牙革命》，（1931-1939年），1973年紐約版，第43-44頁）。
- <6> 《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1970年紐約版，第171頁。
- <7> “對印度工人的公開信”，收集在《不斷革命的年代》，從第246頁開始。
- <8> 關於斯尼夫利也特的生平，見Fritjof Tichelman，《亨克·斯尼夫利也特》，1988年巴黎版。

- <9> 斯尼夫利也特是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書記，在發揚列寧對這個問題的論題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他對大會全體會議的演說中，他為印尼共產黨黨員之參加薩雷克特伊斯蘭辯護，沒有受到任何反對。他這篇演說，收集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第一卷，第150-156頁。
- <10>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印度、埃及、肯尼亞、加諾、尼日利亞等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都爭取了政治獨立，但是都不能突破它們對帝國主義世界制度的臣服。
- <11>這篇文章可以在托洛茨基的1967年密歇根版的《中國革命問題》中讀到；也可以在1976年紐約版的《托洛茨基論中國》中讀到。
- <12>見收集在Jane Degras的《共產國際，1919-1943年，文件》第二卷（1960年）從第336頁開始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ECCI）第七次全會（1926年11月、12月）關於中國局勢的決議案。關於國民黨的問題，這個決議案說：“中國共產黨應該試圖使國民黨成為一個真正的國民黨，一個由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其他正在向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發動一次有力的鬥爭的被壓迫層份所組成的、堅實的革命集團”（第345頁）。
- <13>在1926-27年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之後，接著就是在廣州宣佈成立蘇維埃共和國的極左轉變。由於上海無產階級的失敗和農民運動的低落，這個極左轉變是沒有成功機會的。
- <14>毛在中國共產黨內爭取到支持，打敗了斯大林嫡系，而且在1934年至1941年之間得到了克里姆林宮一定程度的支持。可是，克里姆林宮的阻力加強了，而與斯大林的衝突，因毛拒絕讓人民解放軍融化到蔣介石的軍隊中去，到達了白熱化的程度。從1946年開始，毛的路線就定在奪取國家權力上面。
- <15>我們必須記住，不但是斯大林及其支持者，而且連布哈林、齊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和普列奧布仁斯基等人都忘記，列寧本人，曾以毫不曖昧的言詞，定出了十月革命的中心的政治、階級教訓如下：
- 我們根據本身的經驗知道，——全世界近代的、譬如說一百五十年來的一切革命發展過程也證實了這一點——無論何時何地，結果總是這樣：一般小資產階級，其中包括農民，要覺悟到自己的力量、自己領導經濟和政治的一切企圖，最後都遭到了破產。或者受無產階級領導，或者受資本金家領導，中間道路是沒有的。
- （“在全俄運輸工人大會上的演說”，1921年3月27日，收集在《列寧全集》，第33卷，第277-278頁。上引中譯文，錄自《列寧全集》中文版第32卷264頁）
- <16> “對印度支那反對派的宣言的評論”（1930年9月18日），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1930-1931年》，1973年紐約版，第29-31頁。
- <17> “對南非提綱的評論”（1935年4月20日），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年》，1977年紐約版，第249頁。
- <18> 刊在《托洛茨基論中國》一書內。
- <19> 《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1970年紐約版，第182-183頁。
- <20> 有許多資料可以參考，其中一件是Jack Belden的《中國震撼世界》，1970年紐約版。
- <21> “國際左派反對派，它的任務和它的方法”（1932），收集在《第四國際文件》，1973年紐約版，從第19頁開始。
- <22> 這點被列寧起草的、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通過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提綱所著重。不斷革命戰略的主要元素是包含在這個提綱中，但是沒被發揮。
- <23> 見托洛茨基在《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中對共產國際綱領的批判。
- <24> 引句來自“Pierre Broue”的《托洛茨基》1988年巴黎版，第509-510頁。原文發表在1927年4月14日的“China Press”〔《中國新聞》〕。
- <25> 見1944年8月號的《第四國際》（英文版）上的“李福仁，殖民地人民的革命導師”一文。
- <26> 托洛茨基明確地說明，這只適用在較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
- <27> 列寧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提綱中清楚地著重這個需要。
- <28> 這個引句譯自德文的《托洛茨基論中國的文集1928-1940年》，1990年漢堡版第46頁。
- <29> 同上，第885頁。
- <30> 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與劉少奇的爭論中。
- <31> 這個轉變是在雙重壓力下發生的：一方面，蔣介石的反共的軍事攻勢；另一方面，在華北自發的農民暴動。
- <32> 例如，見Taylor所編的1974年諾丁漢版的《印度尼西亞的鎮壓與剝削》。
- <33> 托洛茨基曾警告中國托派在估計農民軍隊時不要將自己限制在一般公式中。不幸的是，他們沒有聽從這個勸告。可是有些人有另一想法，特別是陳獨秀。
- <34> “中日戰爭開始時，克里姆林宮又把共產黨綁在蔣介石那裡，把中國無產階級的主動力消滅在萌芽狀態”（《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1969年、1973年紐約版，第202頁）。

The 16th CPC Congress steered by Jiang Zemin

Zhang Kai

The 16th CPC Congress officially adopted the Political Report presented by Jiang Zemin. The "Three Represents" concept proposed by Jiang in 2001 was officia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Party Constitution, to be on par with the thoughts of Marx, Lenin,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By this, Jiang attempted to establish his equivalent position in the party's history.

The Three Represents idea was first raised by Jiang on July 1, 2001, on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CPC. The Three Represents was supposed to require party members to "always represen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the orientation of China's advanced culture an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Political Report gave a positive description of the progress of China in the 13 years under Jiang's rule. It highlighted the figure of China's GDP of 2001 to be RMB 9,590 billion yuan, almost two times that of 1989, with an average annual increase of 9.3%. China's total economy has now risen from the 10th to the 6th in the world. The report said that "overall, the people's livelihood has made a historic leap from subsistence to being well-off."

The so-called "well-off" level, as explained by Zeng Yanpei, Director of the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is still of a relatively low level, since China's per capita GDP in 2000 was US\$800, whereas that of medium level developed countries was US\$2,000.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has been premised on capitalist logic, in search of profit and not the people's need. Production therefore has been anarchic, with over-production and factory closures, with massive unemployment, impoverishment and social polarization.

China's unemployment is acute. Zeng Yanpei's report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meeting of March 2002 said the registered urban unemployment rate at the end of 2001 was 3.6%: 6.85 million unemployed, as well as 5.15 million "stepped down" from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 the total was around 12 million.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of the 16th CPC Congress, Zhang Zuojin, Minister of Labour and Social Security, gave the figure as at September 2002 to be 7.52 million registered urban unemployment, with the rate being 3.9%. He admitted that this did not include over 6 million stepped down workers. However, when Zhu Rongji was on a visit to a foreign country, he said the unemployment figure was 7%.¹ Anyway, Zeng Yanpei admitted that many stepped down workers have not found a new job, 10 million graduates enter the labour market every year, and in addition there is much surplus labour from the countryside, hence the issue of unemployment is acute. Professor Xiao Zhuojin from Peking University said that the actual urban unemployment rate is around 15-20%, which does not include the 100 million potentially unemployed rural population; China's unemployment is the worst in the world.² Some experts estimated that in the coming years, China's unemployment will reach 300 million.³

According to the State Statistics Bureau's recent sample survey

on 4000 households from 8 provinces/municipalities, up to the end of June 2002, the lowest 10% income households had a share of 1.4% of the assets of the interviewed households, whereas the top 10% income households had a share of 45%; the remaining 80% had a share of 53.6%. The average assets of an urban household was valued at 228,000 yuan.⁴

The dispar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income is also growing. Officially the average urban household had an income of 6,860 yuan, and the rural household 2,366 yuan. Qiu Xiaohua, Deputy Director of the State Statistics Bureau, said the actual disparity should be 5:1 or even 6:1, instead of the official figure of 3:1. He said, in 2001, the peasant's real cash income per month was 120 yuan,⁵ which means the annual income was not even 1500 yuan. On the other hand, the average annual income of the population of ten major cities was over 10,000 yuan, and in Shenzhen, it even approached 24,000 yuan. The same disparity happens between the eastern provinces and the hinterland provinces. The State Statistics Bureau had it that up to 2001, the Eastern region contributed 57.8% to China's GDP, whereas it was 27.9% from the central region, and 14.3% from the western region.⁶ In 2000, the per capita GDP of the eastern region was US\$1,400, but only USD800 for the western region which has about 30% of China's population. About half of China's 700-800 million rural population live in poverty.

As for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democratization has been thwarted after 1989, and dissidents continue to be jailed or exiled. Workers and peasants fighting for their rights of livelihood and for freedom of gathering and association have also been suppressed. On the other hand, entrepreneurs and professionals have benefited from the state's support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lite. Private entrepreneurs, starting from July 2001, have been formally admitted to be party members. According to a review article of the New York Times, private enterprises now make up about one-third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⁷ In Shanghai, there were,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2002, 220,000 private enterprises, employing 2 million workers.⁸ In Jiangsu Province, non-state owned enterprises comprise 41.7% of the economy, the per capita GDP of the province for 2002 was expected to be 14,000 yuan. Of the 68 delegates from this province to the 16th CPC Congress, over 10 were private entrepreneurs.⁹ Entrepreneurs are now gaining weight not only as party members but also in the party leadership.

With Jiang Zemin continuing to hold on to the position of the Chairman of the CPC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and real power, the 16th CPC Congress signals further politically reactionary and undemocratic regression, and economic revisionism and opportunism. China's problems remain intense.

10 December 2002

⁴ Wen Hui Bao's reprint of Beijing Youth Daily, 1 October 2002.

⁵ Ming Pao, 22 October 2002.

⁶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8 October 2002.

⁷ Apple Daily 12 Nov 2002.

⁸ Wen Hui Bao, 7 Nov 2002.

⁹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11 Nov 2002.

¹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12 Nov 2002.

² 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17 October 2002.

³ Sing Tao Daily, 16 Nov 2002.

目錄

悼念	2	親切悼念王凡西老革命家(1907-2002)..... 十月評論社同人
香港	3	發揮市民力量，繼續加強反對23條立法！..... 本刊評論員
	4	當局無理操控和平遊行人士..... 振言
中國	6	江澤民主控的中共十六大..... 張開
	10	呼籲江澤民全退書..... (轉載)山東大學教授孫文廣
國際	11	反對向伊拉克開戰..... 羅莫、柯里、米勒
	13	美國借9.11建立世界霸權..... 高文
	16	美國最終目標是統治全世界..... 斯托克頓
	18	從日本銀行買私營銀行股份看日本金融危機..... 高島義一
	19	繁榮之後的經濟：一個診斷..... 布勒納
特譯	28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八)..... 曼德爾
英譯	35	The 16 th CPC Congress steered by Jiang Zemin..... Zhang Kai

OCTOBER REVIEW VOL.29 ISSUE 4 2002.12.31

OBITUARY

- 2 In memory of Revolutionary Wang FanxiOctober Review

HONG KONG

- 3 Continue opposition to Basic Law 23October Review commentator
4 Selective prosecution of peaceful demonstrators.....Zhen Yan

CHINA

- 6 The 16th CPC Congress steered by Jiang Zemin.....Zhang Kai
10 Appeal for full retirement of Jiang Zemin(reprint)Suen Wenguang

INTERNATIONAL

- 11 No war with Iraq.....B.Romo, D.Curry,J.Miller
13 US uses 9.11 to build world hegemony.....P.Gowen
16 US sets out on path of global domination.....D.Stockton
18 Japan's financial crisis.....(tr)Zhao Jing
19 The economy after the boom: a diagnosis.....R.Brenner

SPECIAL ARTICLE

- 28 Trotsky as alternative (8).....E.Mandel

ARTICLE IN ENGLISH

- 35 The 16th CPC Congress steered by Jiang Zemin.....Zhang Kai